論　著

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念的變遷(1900-1949)*

周　春　燕**

摘　要

在中國浩瀚的歷史中，兒童所占的篇幅相當有限。時至近代，由於國勢衰頹與西風東漸，兒童因其身繫國族未來命運而被重新發掘，而身為「國民之母」的婦女也被要求在家守護民族幼苗。為了固本培元，中國人更加留意以最佳的方式來餵哺尚無生存能力的嬰兒。配合當代醫學與科技的發達，以母乳哺育的「胸哺」，與以乳製品餵養的「瓶哺」，成為 20 世紀上半葉

* 本文始撰於 2004 年初，原係博士班的報告，此後分別在「近代中國的城市、鄉村、民間文化」——首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討論會（青島：青島大學，2005 年 8 月 9-11 日）、第九屆東亞 STS 網絡會議暨第一屆 STS 學會年會國際聯合會議（臺南：成功大學，2009 年 4 月 17-19 日）、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counters and Transformations: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a Cross-lite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50-1960 (Lond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8-29 September 2009)等會議公開宣讀。本文歷次公開宣讀時，王笛、曹樹基、李尚仁等教授曾惠賜意見，並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詳細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兩種廣受討論的哺乳之道。本文考察的重點有四：一、兒童如何在時代的潮流中重新被發現；二、近代醫者與知識分子對於哺餵母乳及雇用奶媽的看法；三、鮮奶及代乳粉存在於嬰兒市場中的因素及產品訴求；最後，則藉由近代婦女的育嬰經驗與哺育抉擇，討論「胸哺」與「瓶哺」的市場競爭情形。

關鍵詞：母乳、奶媽、牛奶、代乳品、兒童

前　　言

清末內憂外患交逼，國勢危殆，有識之士早已憂心忡忡。甲午敗後，嚴復(1853-1921)譯介《天演論》，更使「亡國滅種」與「強國強種」之說不脛而走。[1] 影響所及，具有孕育子嗣天賦的婦女首先受到重視；20 世紀以後，中國衰頹依舊，人們對於「強種」的期盼日益迫切，再加上西方重視兒童的觀念也於此時傳入，於是兒童乃繼婦女之後，成爲另一個備受關注的族群。

就筆者所見，目前關於傳統中國兒童的研究，以熊秉眞的論著最爲重要。在《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中，她利用唐宋以來的幼科醫籍，對傳統的幼科醫學，及嬰幼兒自出生以迄成長等不同階段的認知與照護，進行詳細的考察。而《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亦以醫書爲主軸，逐項分析曾困擾近世中國兒童的幾類疾病，並從中窺探此期幼齡人口健康變化的大勢。再者，她在《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中，則對近世以前中國兒童的處境及教育有相當精闢的見解。[2] 其

---

1 歷來學界對於嚴復與《天演論》，以及國族、種族等論題的研究甚多，如 Benjamin Schwartz、邵台新、張灝、朱浤源、沈松僑、馮客(Frank Dikötter)等人，均曾為文討論。相關研究回顧，詳見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10），頁 3-8。

2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中，《幼幼》一書第五章〈乳與哺〉，曾對唐宋至明清的嬰兒乳養與哺育情形，如乳兒的正確方法、對乳養者的要求、嬰兒的吮乳條件、如何選擇乳母、以及副食品的餵食等，作深入而精彩的討論。[3] 此外，Anne Behnke Kinney 所編的 *Chinese View of Childhood*，各篇作者也探討西元前 3 世紀至 1960 年代間，有關中國兒童的教養習俗、教育理論、中醫對兒童發展的論述、明清溺嬰風俗與收養棄嬰的慈善機構，以及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等論題，有助於瞭解不同時期，中國人對兒童的看法及教養理念。[4]

事實上，清末民初的各種刊物，常刊載以兒童爲主題的文章。2007 年，柯小菁的碩士論文，即據此探討抗戰前中國新育兒知識體系的建構，以及在此體系下，新母親的角色如何被塑造的情形，其中亦曾論及嬰幼兒的哺乳問題。[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所出現的哺育文章中，作者常援引西方的科學數據，強調母乳對嬰兒有絕大益處，因而鼓勵婦女應親自哺乳。有趣的是，同一時期的報章雜誌中，則出現大量的代乳品廣告，同樣以科學爲號召，強調其產品媲美母乳，可使嬰兒健康茁壯。於是，形成以哺育母乳的「胸哺」，與餵養代乳品的「瓶哺」互相競爭的情況。

本文的架構，即從「強國強種」的社會氛圍切入，連結以上報章雜誌的哺育說法，並考察這些新哺乳知識（包括母乳、牛乳、代乳粉等）的推廣方式。由於輸入中國的代乳品主要出現於 20 世紀之後，故本文以 1900 年爲討論起點，1949 年以後，因客觀環境丕變，故本文不擬討論。此外，文中所討論的被哺育對象，僅限於出生至斷乳前的嬰兒，至於斷乳後的餵養及副食品添加，則不在析究之列。2009 年秋，盧淑櫻的博士論文也考察此一問題，所不同的是，其焦點集中於抗戰前的上海地區；[6] 而筆者涉及其他城市，時間涵蓋抗戰至中共建國前的這段時間。

---

3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103-135。

4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5 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60-67。

6 盧淑櫻，〈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嬰兒哺育與母親角色的重塑，1900-193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9 年 9 月）。

一、健康之兒童乃民族之生機

在歷史的長河中，兒童甚晚受到關注。以西方而言，兒童因被認爲具有原罪，是「不完整的成人」，故長期受到忽略。[7] 直至 18 世紀以後，在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與早期浪漫主義者的影響下，科學家和教育家開始研究童年。[8] 再加上醫療專業與公共衛生的發達，與經濟環境的提昇，以及家庭結構改變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兒童所受關注與待遇也逐漸改善。19 世紀中葉，美國已有改革者爲了鼓勵兒童退出工作場所，而推廣「童年神聖化」的觀念。[9]

（一）兒童世紀的來臨

1899 年年底，瑞典女教育家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在《兒童的

7 《舊約聖經・詩篇》曾提到：「我是在罪惡中生長的，在母親懷我的時候就有罪。」後來，聖奧古斯汀(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又在《懺悔錄》中指出：在上帝看來，每個人都有罪，即使只在世上活了一天的孩子也是一樣，而且，罪惡是會代代相傳的。參見 Colin Heywoo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1), pp. 32-33.

8 Adriana S. Benzaquén, "The Doctor and the Child: Medical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nja Müller ed., *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e and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pp. 13-18.

9 18 世紀以後，伴隨天花疫苗、白喉血清的發展，醫學權威得樹立，醫師們開始推展一連串有利於兒童的措施，包括：鼓勵哺餵母乳、改善公共衛生；20 世紀之後，又推廣預防接種；這些舉動均有效減低嬰兒死亡率。相關討論，參見 Marie France Morel, "The Care of Children: The Influence of Medical Innovation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on Infant Mortality, 1750-1914," in R. Schofield, D. Reher, and A. Bideau, eds.,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6-219; Colin Heywoo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pp. 1-31, 145-155; Nadav Davidovitch, "Negotiating Dissent: Homeopathy and Anti-Vaccination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obert D. Johnston, e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History of Alterative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North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1-28.

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中高喊：「20 世紀將是兒童的世紀」，[10] 這項預言在往後持續獲得迴響，1910 年英國的一份報紙就寫道：「今天的兒童掌握著明日王國的鑰匙」；[11] 1918 年，美國更發起兒童保護運動。此後，國際對於兒童的福利益加重視，並於 1925 年假瑞士日內瓦召集 54 國代表舉行會議（中國亦列其中），討論如何促進兒童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隨即發表〈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1928 年日內瓦國際聯盟設置兒童保護委員會，專門進行爲兒童謀福利之國際工作；1930 年聯美慈幼會於秘魯召開的第六屆大會，則通過幼弱保障案，主張國家應介入兒童最低限度的教育及生活保障。此外，各國政府也多設有兒童局，負責兒童保育工作，至於民間的相關組織，更不知凡幾。[12]

（二）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相較於近代以前西方兒童的處境，中國的兒童則有另一番際遇。對於重視子嗣的中國人而言，兒童雖未曾被指責具有原罪，但這並不表示傳統中國已給予兒童應有的重視，某些窮苦人家甚至還有溺嬰之舉；即使是士紳家庭，也鮮少有人從兒童的立場出發，針對兒童的特性加以考量。根據熊秉眞的研究，過去中國人常基於「成人中心」或「長者爲尚」的理念，主張應對兒童嚴加管教，「道德色彩」甚重；而管教的目的，則具有濃厚的「功能主義」，因爲這些幼童們肩負著興家旺族的重責大任。於是，智育的訓練及道德的教誨成爲多數幼教活動的焦點，許多兒童因此受到壓抑。[13] 所幸，這種情景在近代出現轉變的契機。

早在 1907 年，已有知識分子在雜誌上譯介國外「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肯定兒童活潑好動的本性，以及重視玩具能啓發兒童學習的觀念，

---

10 錢品珐，〈兒童年中的貧苦兒童〉，《婦女旬刊》，卷 19 期 19（1935 年 11 月），頁 221。

11 Colin Heywood, *A History of Childhood*, p. 30.

12 〈中華慈幼協會提倡兒童節〉，《申報》（上海：上海書店重印，1982-1987），1931 年 4 月 4 日，版 13；周汝傑，〈兒童節旳認識與活動〉，《健康家庭》，卷 2 期 2（1940 年 4 月），頁 12。

13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頁 45-127。

挑戰傳統「凡嬉無益」的成見。[14] 此後，隨著國際兒童保育運動的發達，中國也在 1927 年及 1928 年分別於南京及上海，成立中華兒童教育社與中華慈幼協會。九一八事變後，因日本侵略腳步逐漸逼近，社會上闡述兒童對國家、民族重要性的言論也愈見頻繁。1931 年，就有一群關心兒童的人士，因有感於「國家盛衰，視乎民族，民族強弱，視乎兒童」，以及為了糾正中國人過去「只把兒童看作是父母的私有物，成人的附屬品」等錯誤觀念，乃由中華慈幼協會發起，請求政府通令全國以 4 月 4 日作為兒童節，並獲得行政院批准施行。從此，中國有了一個專屬於兒童的節日。1935 年，政府又為了喚起全民注意兒童，遂明令自該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為「兒童年」，以增進兒童的身心健康及保障其各項權利。[15] 這種將兒童與國家命運連結，認為「兒童是國家未來主人翁」的理念，日後不斷地被強調，尤其是抗戰時期，兒童甚至被喻為「民族復興偉業中的民族魂」、「小戰士」、「新中國的小主人」等，[16] 以彰顯他們肩負著復興民族大業，建設新中國的艱鉅任務。

在這波自清末以來重新發現兒童的歷程中，除了要喚起人們重視兒童的教育外，另一焦點則是關心兒童的健康問題。早在 1914 年，已有人以西方兒科醫學發達為鑑，提出「兒童鞠育之得其道，在家庭則為克家之嗣子，在國家則為強果之國民」的說法；[17] 而無錫醫師丁福保(1874- 1952)則基於專業人員的立場，提倡注意乳兒的健康問題，因為「小兒為將來之

---

14 這類提倡「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在 20 世紀前期的雜誌中經常可見，如：善哉譯，〈選擇玩具與兒童教育〉，《婦女時報》，期 7（1911 年 7 月），頁 22；弼，〈怎樣做父母〉，《婦女月報》，卷 2 期 4（1936 年 5 月），頁 46；陸傳籍，〈兒童的遊戲慾與玩具〉，《婦女世界》，卷 2 期 5（1941 年 5 月），頁 24。

15 關於近代中國兒童福利機構的成立，以及兒童節、兒童年的設置，請參見〈慈幼會定「四四」為兒童節，轉呈國府令飭全國舉行〉，《申報》，1931 年 3 月 7 日，版 15；〈全國兒童年實施會的新設施〉，《教育雜誌》，卷 25 號 11（1935 年 11 月），頁 130；錢品琺，〈兒童年中的貧苦兒童〉，頁 221。

16 菊逸，〈紀念兒童節應知：怎樣謀兒童的福利〉，《中國婦女》，卷 1 期 4（1940 年 3 月），頁 11；寒，〈救救孩子——為兒童節而作〉，《婦女月刊》，卷 1 期 5（1941 年 1 月），頁 1。

17 蕉心，〈女子當有普通醫學常識〉，《婦女時報》，期 15（1914 年 11 月），頁 5。

國民，其身體之強弱，實與國家之盛衰有莫大之關係」。[18] 迨兒童節明訂之後，這類的主張更是不絕如縷。孔祥熙(1880-1967)就曾在紀念兒童節的文章中建議：國家對於現有兒童，應「竭力籌維，以保其生，而遂其養，以強其身」，這樣才「足以收安內攘外之永久效果」。[19] 到了兒童年，更有商人以「健康之兒童乃民族之生機」爲標題，大賣兒童藥品。[20]

在一片重視兒童健康的呼聲中，最引人側目的莫過於嬰兒哺育知識的提倡。1933 年，時任上海衛生局局長的李廷安(1898-1948)，就在《申報》上提及：一國國民的強健與否，與其國民在兒童時代關係匪淺。因此，他不僅提倡兒童衛生，也呼籲社會注重嬰兒哺乳，使其能健康成長。[21] 另一位筆名波兒的作者也寫道：

>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將來是要負擔國家重大的責任的。他們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那末，非有強健的身體不可。我國人民，病弱者多，所以被外人稱為「東亞病夫」，其原因都是由於在嬰兒時，未受到良好的養育，長成之後，雖百般調養，終難轉弱為強，可見一個人之身體強弱與否，全在幼時的養育，和嬰孩時的哺乳方法是否得當。[22]

換言之，爲了使將來擔負國家重任的兒童能有健全體魄，必須特別注意哺乳問題，以收固本培元之效。抗戰爆發後，社會上對於嬰兒的營養更加重視。1941 年，行政院衛生署就指出：由於中國有不少嬰兒死於營養不足，所以應加以討論；[23] 此外，也有人提醒民眾：嬰兒營養的好壞，不僅關係著個人終生的健康，同時也影響著國力與民族前途的盛衰。[24]

---

18 丁福保，〈婦孺衛生一夕話〉，《女子世界》，期 1（1914 年 12 月），頁 1；丁福保，〈乳兒衛生談〉，《女子世界》，期 6（1915 年 5 月），頁 1。

19 孔祥熙，〈國難中紀念兒童節的意義〉，《申報》，1932 年 4 月 4 日，版 7。

20 「鷓鴣菜」廣告，《婦人畫報》，期 34（1935 年 11 月），未標明頁數。

21 李廷安，〈兒童節談嬰兒衛生與學齡前兒童衛生〉，《申報》，1933 年 4 月 4 日，版 13。

22 波兒，〈談談哺乳〉，《婦人畫報》，期 39（1936 年 4 月），頁 4。

23 行政院衛生署，〈嬰兒及幼童之營養〉，載於《婦女共鳴》，卷 10 期 5（1941 年 7 月），頁 38。

24 孫江環，〈嬰兒的營養〉，《中國婦女》，卷 1 期 2（1940 年 1 月），頁 34；冰

（三）「國民之母」的職責

然而，尚無生存能力的嬰兒，該由誰來照顧呢？雖說養育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但眞正負起哺育責任的，卻往往是身爲母親的婦女。因此，在討論這一時期的嬰兒養育問題時，還必須參照當時中國婦女的處境。

女性的地位，自清末以來已漸受重視；下迨民國，女性問題更是千絲百縷，不僅包含女性的身體解放，也涵蓋了女子的婚姻自主權、教育權、工作權等。尤其是工作權的爭取，更是許多人所積極提倡的重點，因爲女性能否獨立，實與其經濟能否自立有密切關聯。梁啓超(1873-1929)就認爲：女子地位低下，與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人」有關。[25] 雖然有學者認爲這種說法，否定傳統婦女的經濟貢獻，但其對於近代女子出外就業的鼓勵作用，則不容置疑。[26]

五四時期，胡適(1891-1962)等人又譯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名劇《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劇中女主角娜拉(Nora)在覺醒自己不過是丈夫的玩偶後，毅然選擇離家出走，其代表的獨立自主與解放覺醒的精神，更在社會上激起無數漣漪。[27] 許多婦運人士也積極鼓勵中國女性應效仿娜拉，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爭取就業，做一個獨立自主的新時代女性。於是，婦女應否就職，成爲社會上的熱門話題，不僅許多女性雜誌經常刊登相關討論，[28] 連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黨亦喊出：「女子與男

凝，〈人工育兒經——採用科學的原理，利用土產的營養〉，《婦女月刊》，卷 4 期 4（1945 年 6 月），頁 28。

25 梁啟超，〈變法通議〉，見《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9），之一，頁 37。

26 連玲玲，〈「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4（2006 年 12 月），頁 2-3。

27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3）。

28 如 1924 年 6 月，上海《婦女雜誌》就以「職業問題」為專號，探討婦女就業的各種面相。見《婦女雜誌》，卷 10 號 6（1924 年 6 月）。除此之外，此一時期其他女性雜誌零星討論婦女就業的文章，更是不勝枚舉。

子職業機會平等」的口號。[29] 在這樣的氛圍中，一些婦女開始走出家庭，投入職場。

不過，這些舉動卻引起部分人士憂心。因爲一旦婦女外出工作，將使家中的幼兒無人照料。早在 1911 年就有人指出：提倡女子職業，將使婦女「鞠育子女之心衰」，嚴重影響種族強弱；數年後，《婦女時報》也有文章呼籲婦女應基於「國民之母」的立場，在家妥善照顧嬰兒，因爲嬰兒的健康與否，乃「一生之安健、孱弱繫焉」；並且強調：育兒之事，小則關係家庭興隆，大則關乎國族命脈；稍後又有人指出：婦女責任之重，「尤莫重於撫育嬰孩」，因爲這是「關乎人種進化之原」的大事。[30] 這種基於母親的天職，要求婦女必須留在家中負起養育子女責任的論調，即使在娜拉出走最爲熱門的五四時期，也有人翻譯日本醫學博士速水猛的作品，從醫學的角度探討男女生理及精神上的差異，來反駁娜拉不相信自己既爲人妻、又爲人母的說法。該文曾明白揭示：哺育小兒是女子的天職；而爲母之事，不僅是女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終的目的。[31] 此外，還有人介紹西方愛倫凱的「母職神聖說」，高聲謳歌母性「同太陽、大海一樣偉大」，並指出這種天賦的質性，乃是爲了綿延生命起見，故使婦女具有格外發達的愛護幼兒本能。即使在政府高呼男女職業平等的 1920 年代，也依然有人以此來反對婦女就業。[32]

在工作與育兒兩難的情況下，有人呼籲政府，應模仿蘇聯兒童公育的方法，廣設育嬰所或托兒所，使婦女能繼續就業而無需擔心子女乏人照料。由於 1920 年代的中國仍無此類設施，因此，一些雇不起奶娘的職

29 雲，〈中國女子職業談〉，《婦女共鳴》，期 17（1929 年 12 月），頁 13。

30 錢智修，〈女子職業問題〉，《東方雜誌》，卷 8 號 9（1911 年 9 月），頁 5；蕉心，〈女子當有普通醫學常識〉，《婦女時報》，期 15，頁 3-5；王三，〈婦女職業論〉，《婦女雜誌》，卷 1 號 4（1915 年 4 月），頁 1-2。

31 參見速水猛原著，君實譯，〈自醫學觀之良妻賢母主義〉，以及〈自醫學觀之良妻賢母主義（續）〉，這兩篇文章分別刊登於《婦女雜誌》，卷 5 號 7（1919 年 7 月），頁 6；卷 5 號 8（1919 年 8 月），頁 10。

32 黃石，〈愛倫凱的母性教育論〉，《婦女雜誌》，卷 10 號 5（1924 年 5 月），頁 741、743；雲，〈中國女子職業談〉，《婦女共鳴》，期 17，頁 14。

業婦女，只好在生產後回家照顧幼兒。[33] 1934 年以後，雖然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已有少數私立托兒所，但因收費頗高，只有少數富裕人家將小孩送去就學；至於最需要托兒的勞動夫妻，則負擔不起。[34] 直到 1939 年，仍有職業婦女感嘆：當時社會上的托兒所只是鳳毛麟角，即使只收容那些受經濟壓迫，母親不得不出外工作賺錢的孩子，也仍嫌不足。[35]

另一方面，自 1930 年代以後，隨著中國被捲入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以及國內天災頻繁與政治外交持續緊張，中國的經濟危機也日益加重，要求「婦女回家」的聲浪逐漸浮現。1936 年，《女聲》雜誌就有文章指出：女子不應和男子搶飯碗，否則失業人口將更多，社會也將更不安寧。[36] 這種反對婦女跟男性競爭工作的狀況，不僅止於言論而已，甚至影響政府機關的用人態度。1939 年 3 月，上海郵局就以女子調動不便爲由，呈請昆明郵政總局，規定同年 6 月所招考的初級郵務員考試，不再招收外界女性。這一事件，在當時曾激起許多婦運人士以及職業婦女的嚴重抗議，最後在輿論的壓力下，才勉強改爲未婚婦女可以投考，但已婚女性則不許報考。[37] 再者，即使有部分婦女迫於生活壓力而不得不外出就業，但她們也多半在婚後即辭去工作，專心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38]

---

33 麈奇，〈哺育兒女，誰？婦運前展中一問題〉，《民國日報》（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1985），1929 年 9 月 28 日，版 3。

34 孟如，〈托兒所制度的社會基礎〉，《東方雜誌》，卷 31 號 17（1934 年 9 月），頁 2；碧雲，〈婦女解放與托兒所〉，《東方雜誌》，卷 34 號 5（1937 年 8 月），頁 114。

35 黛娜，〈解除工作婦女的羈絆——一個做實際工作的婦女的呼聲〉，《上海婦女》，卷 3 期 5（1939 年 7 月），頁 4。

36 林漢達，〈中國女子教育的成功〉，《女聲》，卷 4 期 1（1946 年 1 月），頁 5。

37 同年 10 月，上海郵局在招考初級郵務員時，又故技重施，不招收女性，輿論再度嘩然。最後，行政院在給交通部的「呂字第 19527 號」的指令中指示：「嗣後，考試郵務人員，性別應不加限制。」這場風波才逐漸平息。參見余岩，〈一年來的上海婦女工作〉，《上海婦女》，卷 4 期 2（1940 年 1 月），頁 2；白雪，〈郵局招考感言〉；林錫，〈郵局限止女職員的內幕〉；以上兩篇文章，見《婦女界》，卷 2 期 3（1940 年 12 月），頁 7-8。

38 連玲玲，〈「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4，頁 12-16。

事實上，當時「賢妻良母」的論調所以能甚囂塵上，還與政府當局的兩項措施有關。其一，是前文所提的 1930 年代政府重視兒童保育。其二，則是 1934 年蔣委員長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所謂「新生活運動」，其實是一種由在位者所提倡的復古運動，其主旨在發揚中國傳統美德，而最能代表優良婦女傳統的母性，則是當時最受重視與表揚的要素。[39] 此後，隨著日軍節節進逼，在大量人員傷亡之下，攸關國家命脈的兒童也受到空前重視，而要求婦女在家守護民族幼苗的聲浪，乃頻頻出現在平面媒體上。1935 年初，上海《婦女旬刊》所刊載的「中國婦女應上那兒跑？」專題中，就有人指出：中國婦女就是中國民族的母親，她們負有為民族培植健全下一代的使命。同年 10 月，上海婦女月報社更為了配合兒童年而成立母親會，以敦促母親們負起鞠育子女的義務，達成復興民族的偉大使命。[40] 當時，一方面有人指責婦運人士不關心與國家民族福利有關的兒童事業；[41] 另一方面，則以「母親是為著繼承民族的生命而養育孩子」、「哺育嬰兒是母親的神聖任務」之類的話來期勉女性。倘若有婦女不肯親自哺乳，則可能會被指責是有負天職，不夠資格做母親。[42]

二、專家的建議：母乳最好

美國學者史都華．李．艾倫(Stewart Lee Allen)在《惡魔花園：禁忌的美味》一書中，曾對母乳作了如下的描述：「那裡曾經是世上最初的用餐地點，服務親切，地點方便，風景優美，食物新鮮、溫熱。至於價

39 以上關於 1930 年代「婦女回家」的詳細討論，參見許慧琦，〈一九三〇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東華人文學報》，期 4（2002 年 7 月），頁 99-136。

40 鄭午昌，〈中國婦女應上那兒跑？〉，《婦女旬刊》，卷 19 期 1（1935 年 1 月 1 日），頁 2；莘蓀，〈母親會的意義〉，《婦女月報》，卷 1 期 9（1935 年 10 月），頁 6。

41 菊逸，〈紀念兒童節應知：怎樣謀兒童的福利〉，《中國婦女》，卷 1 期 4，頁 11-12。

42 善如，〈與做母親的討論兒童教養問題〉，《婦女月報》，卷 1 期 4（1935 年 5 月），頁 13；孤軍，〈紀念母親節的意義〉，《中國婦女》，卷 1 期 5（1940 年 4 月），頁 13；丁寶鈞，〈人工哺乳〉，《醫潮》，期 2（1948 年 2 月），頁 16。

格——便宜之至！母奶，直接從母親胸部流出來的奶水，是最原始的特價套餐。」[43] 短短數十字，道盡母乳的各項優點！的確，對嬰兒而言，母乳無疑是造物者賜給他們最自然、最簡便的食品。因此，自古以來人們便多半採用此種方式餵養嬰孩。

然而，在人類史上，許多貴族或富裕階級，卻往往捨棄母乳，而另覓他人餵養嬰兒。如中世紀佛羅倫斯的中產階級，以及近代以前的英、法、德等地的貴族婦女，常因疾病、愛美、忙於社交生活，以及丈夫的干預等因素，而習慣將嬰兒送至鄉下，交由奶媽餵養。直到 18 世紀，仍是如此。[44] 由於奶媽們經常得同時哺餵雇主以及自己的小孩，以致許多嬰兒未受到良好的照顧。

另一方面，隨著人們對初乳的免疫功效與通便作用逐漸了解，[45] 以及 1740 年後歐洲的執業醫師和科學家們大量發表有關兒童健康的專著，肯定母乳是上帝賦予嬰兒最自然、最美好的食品，於是，鼓勵餵母乳的聲音也逐漸加大。醫學專家還指出：餵母乳不僅可使嬰兒健康，同時也有助於母子關係的建立。反觀奶媽，則多是污穢、貪婪、無知而粗心大意的女人，這些不好的特質將透過乳汁傳染給嬰兒。[46] 1762 年，盧梭也

---

43 史都華・李・艾倫著(Stewart Lee Allen)，朱衣譯，《惡魔花園：禁忌的美味》（臺北：時報文化，2005），頁 191。

44 近代以前，英國的丈夫們常堅持雇用奶媽。這可能和 16、17 世紀醫師的看法有關，他們認為：做愛將使母親的乳汁變質，影響嬰兒健康，故要求哺乳中的母親必須禁慾。許多丈夫們不願犧牲自己的性生活，又想讓嬰兒存活下去，於是將嬰兒送往鄉下，長期交由奶媽餵養。見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427. 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頁 64。另外，關於 20 世紀以前西方雇用奶媽的情形，可參見 George D. Sussman, *Selling Mothers' Milk: The Wet-Nursing Business in France, 1715-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Valerie A. Fildes, *Breasts, Bottles and Babies: A History of Infants Feeding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2-210; Shulamith Shahar, *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40-142.

45 在前工業社會，初乳因其顏色及濃稠度均與後來的乳汁不同，且其分泌時產婦的惡露也仍未排淨，故人們認為是初乳是不潔之物，應予丟棄。見 Valerie A. Fildes, *Breasts, Bottles and Babies*, pp. 81-91.

46 Adriana S. Benzaquén, "The Doctor and the Child," pp. 13-20.

在《愛彌兒》(*Émile*)中指出：餵母奶可使母親、嬰兒及家庭的關係更爲緊密，並爲社會革新提供基礎。而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1754-1793)則親自哺乳，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母乳的肯定。就在這些專業醫師與社會名人的鼓吹下，至 18 世紀末，餵母乳已形成一股狂潮，連法國國民議會都在 1793 年通過法案，明訂貧窮的母親和未婚媽媽們，必須親自哺餵母乳才能獲得國家的補助。一年後，德國也通過法案規定健康的婦人全都得親自哺乳。至法國大革命時，慈愛母親的純潔乳汁甚至被拿來和舊政權的貴族對比，因爲那些貴族通常由奶媽餵養，是吸吮污穢奶水長大的。在哺餵母乳的共和美德與雇用奶媽的貴族腐化相互對照下，讓女人認爲餵母乳是愛國的行爲，是支持新政體的表現。自此，哺乳不再是母子間或家庭內的私事，而是成爲盧梭所期待的公民責任的集體表現。[47] 再者，由於 18 世紀以來人們即迷信科學，故醫界也提出科學數據，證實餵母乳比雇奶媽、或使用代乳品要好得多。在醫師們不斷地使用「應該」、「責任」、「義務」等字眼來鼓吹餵母乳的同時，母親的責任也隨之加重。[48]

（一）母乳為「育兒之生命素」

中醫對於母乳成分的了解，雖晚於歐美等國，但對於哺餵母乳的肯定，則早在宋代的《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已見記載。所謂「兒生自乳養者，一切不論」；亦即只要是生母親自哺乳者，大致少有問題，可以不必討論。[49] 至於民眾實際的哺育行爲，也是除少數富貴人家外，都

---

47 Marilyn Yalom, *A History of the Brea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p. 111-117.

48 1869 年納菲醫師(Dr. Naphey)曾指出：里昂、帕特內等歐洲城市養育院的嬰兒，普遍由奶媽哺乳，死亡率分別為 33.7%與 35%，巴黎、理姆斯、愛克斯等地的養育院嬰兒則多食用代乳品，死亡率更高達 50.3%、63.9%與 80%。另一份 1900-1903 年關於英國德比(Derby)地區嬰兒死亡率的調查也顯示：人工哺育的嬰兒，在周歲內的死亡率為 19.8%，而餵母乳的嬰兒則只有 7.0%。以上分參見 Marilyn Yalom, *A History of the Breast*, pp. 226-227; John Knodel and Etienne Van de Walle, "Breast Feeding, Fertility and Infant Mortality: An Analysis of some Early German Data," *Population Studies* 21:2 (September 1967), p. 115.

49 原見〔宋〕佚名，《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卷 2，〈乳母論〉，轉引自熊秉真，《幼

圖一　傳統婦女餵母乳圖

圖版來源：Anthony Lawrence, *The Taipan Traders: A Portrait of Hong Kong's Days of Youth from the Finest Collections of China Trade Paintings* (Hong Kong: Form Asia Books Limited, 1992), p.86.

由母親自乳，可說是自古就盛行以母乳育兒。[50]（見圖一）

西風東漸後，近代歐美關於餵母奶有益於母、嬰的說法，也逐漸在中國傳播，許多專業的醫者以及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在一些雜誌中公開呼籲母親最好親自哺乳。這些文章多半基於西方的醫學理論，來闡明母乳的優勢，以增加其說服力。如留學於日本產婆學校的瞿姚英乃就指出：母乳的乳質及濃淡程度與營養成分，恰能與嬰兒的體質以及不同階段的消化能力相配合，而無過與不及的困擾。她還分析人乳

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114。

50 達如，〈育嬰的法則〉，《婦女雜誌》，卷 15 期 10（1929 年 10 月），頁 38-39。

和各種獸乳的成分差異，指出：牛乳與羊乳的蛋白質均較人乳爲高，而糖分則較少，故不適於嬰兒。[51] 日後，許多專業醫師，如留美醫學博士李廷安、賴斗岩，留日醫師陳卓人等，也持類似看法，認爲：若以牛奶取代母乳，將使嬰兒腸胃負擔過重，無法消化；且熱量也不敷身體所需，日積月累，將影響其生長發育。[52]

再者，初乳的緩瀉及免疫功能，也是母乳的特色之一。傳統中醫雖肯定人乳具有延年益壽的功效，[53] 但對於初乳，則未特別著墨。過去，社會上普遍認爲新生兒體內帶有「胎毒」，故不主張立刻餵乳，而是以甘草汁、牛黃、黃蓮、人蔘湯等「去胎毒」藥方，取代初乳。此外，民間還有「開奶」習俗，即另覓一兒女雙全、身體健壯的婦人，餵嬰兒第一口奶；[54] 甚至還有人認爲：延遲第一次哺乳的時間，有助於將來小兒長相清秀，故有些產婦在經過一晝夜後才開始授乳。這些中醫藥方及民間習俗，都證明傳統中國對於初乳功效的陌生。1915 年，無錫醫師萬青選就著書教育民眾：產婦於分娩後 2-3 日內所分泌的初乳，不僅符合新生兒的需要，同時還能「令其瀉下腹中之毒」。[55] 1926 年陳卓人醫師更直接提及：喝母乳的嬰孩可從母乳中獲得免疫物質，不僅體質較佳，甚至還「性質爽快、多笑顏。」[56] 1947 年，留德的女醫學博士，時任上海市立兒童醫院院長的蘇曾祥也指出：母親所患過的疾病，其抵抗力可透過母乳傳給嬰兒，使嬰兒不易罹病，這是牛乳等代乳品所無法提供的。類似說法，也出現在同年的《家庭醫藥》雜誌上。[57]

---

51 瞿姚英乃，〈小兒營養法〉，《婦女時報》，期 15（1914 年 11 月），頁 25。

52 陳卓人，〈牛乳和人乳的比較〉，《婦女雜誌》，卷 10 期 3（1924 年 3 月），頁 569；李廷安，〈兒童節談嬰兒衛生與學齡前兒童衛生〉，《申報》，1933 年 4 月 4 日，版 13；賴斗岩，〈兒童衛生〉，《教育雜誌》，卷 25 號 12（1935 年 12 月），頁 50。

53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 52，〈人部・乳汁〉，頁 2951。

54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92-93；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頁 60-61。

55 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上海：進化社，1915），頁 123-124。

56 陳卓人，〈牛乳和人乳的比較〉，《婦女雜誌》，卷 10 期 3，頁 569-570。

57 蘇曾祥，〈母親應該自己哺乳——兼談怎樣選擇奶媽〉，《家》，期 13（1947 年

此外，也有人從微生物學的觀點出發，指出吸母乳時直接以口就乳，故微生物不易混入嬰兒體內；即使眞有少量微生物混入，但因乳汁由口至胃的時間很短，不易起變化，且微生物一到胃內，即爲胃液所殺，這是母乳能常保適當的溫度，而又能「無微菌，不致腐敗」的關鍵。[58]

可見，就增進嬰兒健康的角度而言，無論從生理學、營養學、免疫學，或是微生物等觀點出發，母乳都具有無可取代的優越性，而實際的調查數據也是如此。抗戰期間，衛生署中央衛生實驗院婦嬰保健組爲落實保嬰計畫，曾撥專款委託國內各婦嬰機關對周歲以內的嬰兒進行死因調查，結果發現：以人乳（含奶媽）哺育的嬰兒，其死亡率爲 128.7‰，以代乳品等人工哺育方式的嬰兒死亡率，則爲 401.1‰。[59] 顯然，餵母乳的嬰兒，其健康狀況要比人工哺育的嬰兒好很多。

另一方面，也有育兒專家從母親的角度出發，闡述餵母乳對母體的好處。作家波兒就提醒婦女：小兒吸乳動作的刺激，可使子宮收縮增強，預防產後出血，並促進母親下腹部器官，早期恢復正常狀態。[60] 本身即爲女性的蘇曾祥醫師，也有相同的專業見解，並指出：餵母乳對於母嬰雙方面而言，是一種「兩得其益」的行爲。[61] 另一作者善如，則認爲餵母乳可增進親子關係。此外，她還提及：「產婦親自哺乳，可以防止第二次受孕過早」，從避孕的角度來鼓勵婦女親自哺乳。[62] 這對當時普遍缺乏有效避孕、經常懷胎的婦女而言，或許也是吸引她們餵母乳的誘因之一。[63]

---

2 月），頁 63；黃靜生，〈母乳的成分〉，《家庭醫藥》，期 9（1947 年 6 月），頁 20。

58 陳卓人，〈牛乳和人乳的比較〉，《婦女雜誌》，卷 10 期 3，頁 569；善如，〈與做母親的討論兒童教養問題〉，《婦女月報》，卷 1 期 4，頁 14。

59 程美玉，〈我國嬰兒死亡率及死因之檢討〉，《中華醫學雜誌》，卷 34 期 2（1948 年 2 月），頁 57。

60 波兒，〈談談哺乳〉，《婦人畫報》，期 39，頁 4-5。

61 蘇曾祥，〈母親應該自己哺乳——兼談怎樣選擇奶媽〉，《家》，期 13，頁 68。

62 善如，〈與做母親的討論兒童教養問題〉，《婦女月報》，卷 1 期 4，頁 13-14。

63 近代中國雖已出現禁慾法、體外射精法、陰道灌洗法、避孕套，以及避孕藥等節育方式，但或因實行不易，或因成效不彰，或因流通不夠普遍等，故許多婦女仍飽受

當然，餵母乳還相當便利與經濟。因爲母乳的成分與濃度，恰能符合小兒的營養與生理，可以隨意乳哺，毫無他慮。反觀使用牛乳或代乳品，勢必需要一定的調製手續，其便利性自然不及母乳。[64] 而且，無論是雇用奶媽，或是購買牛奶、代乳粉等，對父母而言，都是一筆額外的負擔，故餵母乳對多數民眾而言，自然是最爲經濟的。[65]

（二）餵母乳的科學方法

美國學者瑞瑪·艾波(Rima D. Apple)，曾研究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科學與醫學知識對美國哺育行爲的影響。結果發現，當時的科學家與醫學家經常宣稱：媽媽們需要依照他們的忠告行事，才能確保嬰兒健康。這種見解，不僅得到教育家、社會評論家的支持，甚至連媽媽自己，也深信不疑。這種母親遵行專家意見而進行的照護行爲，被稱作「科學母職」(scientific motherhood)，在進入 20 世紀之後，透過女性雜誌、育兒書籍，或學校中的家事課程大量傳播；而婦女與生俱來的母性本能，以及傳統那些透過經驗而來的育兒知識，則遭到貶低的命運。[66]

20 世紀初，這股「科學母職」的風潮也吹到中國。從前一節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在雜誌上鼓吹母乳優點的作者，多半具有醫學背景。而且，他們對近代中國婦女哺育行爲的干涉，也不僅止於鼓勵婦女親自哺乳而已，同時，還要求母親在哺乳時，必須遵照他們的指示，如乳房的護理、規律的餵食，以及哺乳期的母體照護等，才能確保母嬰健康。

多孕之苦。為此，有些女性會以餵母乳來達到避孕的目的。見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 87-89；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頁 356。另外，關於近代中國節育的討論，請參見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發展——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95-230。

64 麑書，〈乳哺小兒應注意的要點〉，《婦女雜誌》，卷 16 號 4（1930 年 4 月），頁 4-5。

65 楊敏閑，〈談談嬰兒哺乳〉，《婦女月刊》，卷 3 期 5（1944 年 4 月），頁 37。

66 Rima D. Apple,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8:1 (April 1995), pp. 161-178.

類似的知識，在傳統的醫書中雖有著墨，[67] 但內容較爲籠統，且強調重點亦與西醫不同。

首先，關於乳房的護理：傳統醫籍對於哺乳前的準備，主要著眼於增進嬰孩的舒適度，如「凡每乳兒，乳母當先以手按，散其熱，然後與兒吮之。」[68] 但近代西醫則側重於增進衛生及預防傳染病。如產前必須每日以酒精、甘油擦拭乳頭，使皮膚變硬，以防將來餵乳時皮膚破裂而引發乳瘡。[69] 此外，當時的嬰兒常因母親「乳房之不潔淨」而引起鵝口瘡或其他傳染病；故這些育兒文章也常提醒婦女：授乳前，不可用自己的唾液濕潤乳頭，而應先以石鹼、硼酸水，或是溫水洗淨乳頭、乳暈。至於哺乳後，則建議用脫脂棉與硼酸水拭淨嬰兒的口及乳頭。[70]

值得注意的是，定時哺乳的被提出，或許也和鐘點時間的引入有關。過去中國一向以「時辰」或「刻」爲計時單位，無法作精確的分時；但隨著同光時期(1862-1908)國外鐘錶的大量進口，[71] 以及中國人自製鐘錶的成功，其價格也隨之下跌，[72] 爲民間使用鐘點時間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

67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104-110。

68 〔宋〕不著論者，《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卷 2，〈哺兒法〉；轉引自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104。

69 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頁 357。

70 關於哺乳前後的乳房護理，參見初生阿侯者，〈小兒生產後之第二個月〉，《婦女時報》，號 13（1914 年 4 月），頁 54；梅夢，〈簡易家庭看護法〉，《婦女雜誌》，卷 1 期 4（1915 年 4 月），頁 5；麐書，〈乳哺小兒應注意的要點〉，《婦女雜誌》，卷 16 號 4，頁 5；善如，〈與做母親的討論兒童教養問題〉，《婦女月報》，卷 1 期 4，頁 14。

71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 197。

72 早在 1852 年，華人張恒隆已在上海開設埠內最早的鐘錶店。據說，該店當時已掌握製作鐘錶的技術；1876 年，孫廷源在上海開了第二家華資鐘錶店，並於 1905 年在鄞縣設廠大量製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店併購德商在滬的另一家老字號鐘錶店——亨利達鐘錶店；其後，利用大戰結束後西方經濟蕭條，貨幣貶值之際，低價大量進口歐洲手錶，並先後在全國開設 25 家分店，被稱為「鐘錶大王」，直到 1949 年，仍執中國鐘錶業之牛耳。見王安堅，〈鐘錶史趣談〉，收入上海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輯 6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135-138。

於是，擁有鐘錶的中國人，開始能夠更加精確地以時、分、秒等單位來利用時間，而哺乳的間隔與每次應哺乳若干分鐘，也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被精確地規範。

此外，近代對於哺乳期母體的照護也相當重視，以確保乳汁分泌順暢、充足。相關內容包括：注意清潔、適度運動、放鬆心情，以增強母體的健康；並於每次餵乳前適度按摩乳房，以促進乳汁分泌；給予乳房適當的支托，以保護乳房等。[73] 同時，也鼓勵哺乳婦女注重營養的攝取，「多食西紅柿、波菜、肝、肉等滋養、易消化者，牛乳、雞蛋、雞湯等，若調護適宜，非但値產婦健康早日復原，且可使乳量充足。」[74]

（三）強種愛國的生乳藥

對於一些願意親自哺乳的媽媽而言，缺乏乳汁可說是她們最大的遺憾。因此，也有廠商看準這一市場，推出相關藥品。由於傳統中醫認爲：乳汁是母親血液的變體，[75] 故當時市面上有不少產品即以「補血旺乳」爲其訴求重點。如 1925 年上海《婦女雜誌》就出現一則標題爲「有強健之母，始能撫育茁壯之嬰兒」的廣告，內容提到：「世多夭殤之嬰兒，實因其母親之乳汁不足養之」，故強調其產品「能令母子立即強健，血氣充盈，乳汁有力」。[76] 1931 年，《申報》上也有「巴德補血酒」，強調可使哺乳者「乳汁增多，而嬰兒亦必健碩可愛」。[77]

當時，市面上還有一種專門刺激乳汁分泌的成藥。如 1930 年代初期，

---

73 逸珠，〈乳房的常識〉，《婦女雜誌》，卷 2 期 2（1941 年 2 月），頁 38-39。

74 文潔，〈從行經到生產〉，《婦女雜誌》，卷 4 期 8（1943 年 8 月），頁 32。

75 如《醫心方》記載：「婦人手太陽少陰之脈，下為月水，上為乳汁」；《本草綱目》亦云：「蓋乳乃陰血所化，生于脾胃，攝於衝任。未受孕則下為月水，既受孕則留而養胎，已產則赤變為白，上為乳汁，此造化玄微，自然之妙也。」見丹波康賴撰，趙明山等注釋，〈治產後無乳方第卅十六〉，卷 23，《醫心方》（瀋陽：遼寧技術出版社，1996），頁 926；〔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人部一類・乳汁〉，頁 2950。

76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廣告，《婦女雜誌》，卷 11 期 1（1925 年 1 月），廣告頁無頁碼。

77 「巴德補血酒」廣告，《申報》，1931 年 3 月 1 日，版 15。

《申報》及《婦女雜誌》上就常出現一種名爲「百靈自來奶藥」的產品，標榜奶水不足者，只要服用三天，即能「奶水大出如泉湧，且有改善乳質之功，可令母健子肥」。[78]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該廠商又配合「愛用國貨」的氛圍，不僅在廣告中表明其產品是由「中央衛生試驗所驗證」的「促成乳汁分泌特效藥」，並且提到：

> 育兒要品，產婦宜服。吃不完好奶水！快活兒子，快活娘。愛國愛兒者請注意！乳閉、乳少之產婦，如用外國代乳粉哺育其兒，因不合我國人之體質，有礙嬰孩之消化，故多瘦弱善病，非愛子，亦非愛國也！百靈自來奶藥為催發乳汁之靈藥，效力神速，服藥後，能使良質之奶水，源源而出，既可節勞省費，又令母健子肥，欲望愛兒發育安全者，亟宜服之（見圖二）。

另一方面，在日人控制之下的《盛京時報》，則有「歐美生乳藥」，亦標榜是「服後乳汁湧湧而來」的「下乳之良藥」（見圖三）。

圖二　百靈自來奶藥

資料來源：「百靈自來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7 期 10（1931 年 10 月），廣告頁無頁碼。

圖三　歐美生乳藥

資料來源：「歐美生乳藥」廣告，《盛京時報》，1937 年 7 月 6 日，版 1。

---

78 「百靈自來奶」廣告，《申報》，1931 年 3 月 28 日，版 7。

雖然這幾則廣告內容都相當簡短，但卻透露不少訊息：一、彼時有意餵食母乳、而自身乳汁不足的婦女應不在少數，因此催乳藥有其市場；二、儘管當時市面上有代乳粉可供選擇，但因代乳粉多是舶來品，不僅價格昂貴，且未必適合國人體質，故有不少婦女還是願意親自哺乳。三、中國自清末以來，因受外人欺侮而興起「強國強種」的領悟，直到 20 世紀上半葉仍深印在許多國民的腦海裡，故廣告商也迎合這種時代精神，訴諸「母健子肥」及「愛用國貨」的心理，使民眾相信購買其商品，其實也是一種「愛國之舉」！

（四）人乳的另一選擇：奶媽

哺育嬰孩固然以母乳爲佳，但若產婦是職業婦女，或患有傳染病、乳少、閉乳、乳房發育不全、精神病、死亡，甚或因爲害怕衰老等因素，均可能使產婦無法親自哺乳。[79] 此時，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請奶媽（乳母），一種是餵牛奶，「但這兩種辦法，都是窮困的父母難以勝任的」。[80]

其實，過去上層階級雇用奶媽至家乳養嬰兒的情形相當常見，許多醫籍也都提到選擇乳母的注意事項，可見中醫並不反對雇乳。[81] 時至近代，富貴之家仍是每逢生兒育女，「不論自己有奶沒有，總要請奶媽在家裡給自己的子女吃奶。」[82] 1936 年，著名的醫藥專家葛克全(1909-2007)就提到：當時中上之家的婦女，「每生一孩，可雇乳母，專司其事」。[83] 過去富裕人家之所以習慣雇用奶媽，一般認爲有幾個因素：

其一，可省生母之勞：親自哺乳，不勝煩苦，這一點，可從前文所提，嬰兒每日必須哺乳 8-4 次，每次哺乳 10-20 分鐘的情況看出端倪。所以，在經濟條件許可下，許多家庭都會雇用奶媽以代其勞。1914 年，瞿

---

79 素貞，〈給年輕的母親們〉，《婦人畫報》，期 47（1937 年 3 月），頁 30。

80 葉子，〈育嬰記〉，《婦女月刊》，卷 5 期 5（1947 年 2 月），頁 27。

81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114-118。

82 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頁 365。

83 葛克全，〈節制生育與國民健康〉，《醫事公論》，卷 3 期 16（1936 年 6 月），頁 3。

姚英乃就指責雇用奶媽是富貴人家的「慵懶之婦」所爲。[84] 其二，可以誇耀鄰里：由於雇用奶媽的費用相當高昂，所以，雇得起奶媽者，非富即貴（詳見第四節）。其三，爲求多孕廣嗣：哺乳期間婦女內分泌將會改變，有助於避孕；富家大戶爲使婦女能盡快懷孕，開枝散葉，常雇用奶媽代爲哺乳。出身於書香世家的史學家周一良(1913-2001)，就曾回憶他的繼母許和之女士說：

> 在我的印象裡，許太夫人平常總是坐在牌桌上打麻將，還有就是坐月子。十年之間，她生了八個弟妹，此外有兩個小產了……生產以前就雇好奶媽，孩子一生下來就交給奶媽去喂〔餵〕養。[85]

從這段敘述可以發現：周一良的繼母在 10 年之中，共懷孕 10 次，可說是年年都處於懷孕、生子的循環之中。倘若她是親自哺乳，則無法如此多育。另外，出身合肥大戶人家的張兆和（1910-2003，沈從文之妻），其母陸英在夫家子嗣稀少的情況下過門。此後 14 年間，共育有 9 名子女，也是多產，而這些孩子都是由不同的奶媽分別哺育。[86] 高誦芬也說：在大戶人家裡生活，只生一兩個孩子就不生了，會被人家講閒話。所以，多半會請奶媽。[87] 最後，也有部分愛美的女性，以爲哺乳之後，將使容顏衰老，或身材會因而走樣，所以不願哺乳。[88]

近代醫者雖積極提倡餵母乳，但本著對人乳功效的肯定，多數醫師（包括行政院衛生署）也都同意：倘若母親因故無法親自哺乳，那麼，可優先考慮請奶媽代勞，並且開列若干有別於傳統觀念的擇乳母條件，供父母參考（見表一）。從表一可以看出，近代因受西方醫學及檢驗技術發達之賜，人們選擇乳母時，除了保有傳統的條件外，還多了些以往所忽略的項目。如：以往民間對於乳婦的年齡，並未多加注意；到了近代，則多會將年齡列入考慮，尤其希望有育兒經驗，這樣才能給嬰兒較

84 瞿姚英乃，〈小兒營養法〉，《婦女時報》，期 15，頁 24。
85 周一良，《鑽石婚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23-24。
86 金安平著，鄭至慧譯，《合肥四姊妹》（臺北：時報文化，2005），頁 9-16。
87 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頁 365。
88 素貞，〈給年輕的母親們〉，《婦人畫報》，期 47，頁 30；雷茂榮，〈為乳兒要求母乳說幾句話〉，《大眾醫刊》，期 3（1931 年 5 月），頁 32。

表一　中、西醫對於乳母要求比較表

項目	傳統中醫擇乳母的條件	近代西醫擇乳母的條件
健康要求	1. 無胡臭、瘿瘻、氣嗽、瘑疥、癡癃、白禿、癧瘍、瀋脣、耳聾、齆鼻、瘨癇」等。 2. 最好由有經驗的醫師檢查其身體，以判斷是否患有不適傭乳的疾病。	1. 乳婦本身需健康完全：無梅毒、花柳病、淋病、結核病、腳氣病、沙眼、傳染性皮膚病（如疥瘡等）。 2. 需到醫院檢驗體格及血液、尿液、大便。
家族病史		需檢查乳婦的近親、父母、兄弟、姐妹，有無肺病、梅毒、精神病，及其他一切傳染病，有之，則不可用。
外貌	體態合宜：肌肉充肥；忌「獨眼跛足、龜胸駝背、鬼形惡貌、諸般殘疾者」。	1. 胸廓開展、乳房須緊張飽滿。 2. 貌端美、顏色亦須秀麗清潔、口脣帶紅色，齒潔白而排列勻稱；能皮膚白皙、面貌端莊、身體壯碩、乳汁充足者，薪資可稍優。
乳汁	乳汁需濃白。	擠壓乳婦的乳房，觀察其射出乳汁是湧出或線狀或滴出，以判斷乳汁多寡。
年齡		以 35 歲以下為最適。最好有育兒經驗。
生產時間		最好與生母的生產時日，相差不過兩個月，以免乳汁成分相差過多。
性情	情性和悅、純厚、篤實、婉靜寡慾、知寒溫之宜。	性情溫和、品性端正、做事聰明，以溫厚篤實、謹慎者為佳。若能找到略受過教育的更好。
生活習慣	衛生習慣良好。	生活平靜、睡眠充足、適當的勞動、營養均衡、衛生習慣良好。

資料來源：關於傳統醫籍選擇乳母的條件，參見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114-118。至於近代擇乳母的條件，資料甚多，如：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上海：進化社，1915），頁 129-131；郭我力編著，《新女性手冊》（上海：中國圖書編譯館，1940），頁 111；行政院衛生署，〈嬰兒及幼童之營養〉，《婦女共鳴》，卷 10 期 5（1941 年 7 月），頁 39；蘇曾祥，〈母親應該自己哺乳——兼談怎樣選擇奶媽〉，《家》，期 13（1947 年 2 月），頁 63。

好的照顧。再者，近代西醫也特別注重奶媽的生產時間最好與生母相近，這樣，其乳汁的濃淡程度，較能符合嬰兒所需。第三，近代西醫多會要求乳母必需到醫院檢查，而其內容則包含生理正常與心理健康，甚至還要求審查乳婦的家族病史。最後，傳統醫籍中所列不宜傭乳的疾病，在近代較爲少見，代之而起的，則是當時常見的傳染病或流行病，尤其是性病，更是當時許多雇主所擔憂的問題。1947 年，筆名葉子的作者就在雜誌上分享她雇用奶媽時的憂慮：

〔奶媽〕這種被迫捨棄了自己孩子的貧苦婦女，大半是由於丈夫的荒唐，不努力生產所致，因此很容易染有各種性病。[89]

可見，近代擇乳母的條件，與當時中國的國情有其一致之處，而不再只是墨守傳統醫籍的建議。不過，也由於條件煩瑣，因此，即使經濟能力許可，仍有不少婦女面臨奶媽難請的痛苦。1934 年，一位名叫譚影的作者就提及：自己剛出生時，因爲母親缺乳，又吃不慣代乳粉，家人只好雇用奶媽。但找來找去都不合適，直到他 4 至 5 個月的時候，才找到一名乳汁充足的奶媽；但在這之前，他的父母已經爲他換過 8 至 9 個奶媽了。[90]

三、廠商的促銷：科學營養的代乳品

當母乳和奶媽的乳汁都不可得時，人們只好採取人乳以外的「人工哺育法」。人工哺育的食品很多，包括牛乳、馬奶、羊奶、驢乳、豬乳等動物性乳品；以及奶糕、豆漿、米湯、麵糊、稀飯、菜湯等植物性食料。[91] 據一份 1937 年的資料所載，當時中下人家，若遇母乳不足，多以價格低廉的奶糕代替；由於奶糕以白米製成，澱粉多而蛋白質少，嬰兒食之，可能有營養不良、生長遲滯等危險。因此，稍有能力者，多以動

89 葉子，〈育嬰記〉，《婦女月刊》，卷 5 期 5，頁 28。
90 潭影，〈乳母〉，《老實話》，期 50（1934 年 12 月），頁 387。
91 瞿姚英乃，〈小兒營養法〉，《婦女時報》，期 15，頁 25-26；冰凝，〈人工育兒經——採用科學的原理，利用土產的營養〉，《婦女月刊》，卷 4 期 4，頁 28。

物性乳品餵哺。[92] 其中，又以牛乳、羊乳，及牛乳製品（代乳粉）較常被使用，故本文以此三者爲討論對象。

（一）功同人乳的牛奶

牛奶是人們經常使用的母乳替代品之一，傳統中醫對於牛奶的功效，也給予肯定，《本草綱目》就載：牛乳可以養心肺、補虛羸；[93] 道光年間的文海，則在《衛生匯錄》中指稱：牛乳「最能滋潤臟腑，補益眞陰，美潤容色，療治百病。」又說：其「服法功效，俱同人乳，但力應略微。」[94] 清代名醫王士雄（字孟英，1808-1868）也說：牛乳「功同人乳」，故小兒失乳者，可以代之。[95] 可見，以牛乳代替人乳，早已有之。而牛乳的生產也常見於記載，如元代的《鎭江志》，以及明代的《姑蘇志》都有相關敘述。[96] 另外，清道光年間，顧祿在《清嘉錄》也說：「寒冬，鄉農畜乳牛，取乳汁入瓶，日擔於城，鬻于主顧之家。」[97] 可見，牛乳在傳統中國已擁有許多愛用者。有些育嬰堂甚至還飼養牛隻，取乳育嬰，如乾隆年間溫州府永嘉縣的育嬰堂即是一例。[98]

---

92 偉，〈用鮮牛乳哺育嬰兒的方法〉，《家庭星期》，卷 2 期 15（1937 年 3 月），頁 234；侯祥川述，吳傳歡錄，〈奶糕不適於育嬰〉，《醫潮》，卷 2 期 2（1948 年 2 月），頁 18。

93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獸部一・牛〉，頁 2751。

94 〔清〕文海，《衛生匯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居家應世養生調攝各法〉，「牛乳」條，頁 125、198。

95 〔清〕王士雄，《隨息居飲食譜》，收入〔清〕王士雄著，盛增秀主編，《王孟英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0），頁 206。

96 〔元〕《鎭江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9），卷 4，〈土產・飲食〉，頁 118；〔明〕《姑蘇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正德元年刻本影印，1965），卷 14，〈土產〉，頁 18a。

97 〔清〕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 11，〈十一月〉，「乳酪」條，頁 3b。

98 〔清〕《永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24 年補刊本影印，1983），卷 35，〈庶政〉，「育嬰堂・牛乳哺嬰規條」，頁 7b-8b。

1. 營養豐富的鮮牛乳

五口通商之後，隨著西方文化大量引進，牛乳的功效也在這一波文化移植中，獲得進一步的肯定，甚至有人誤以爲「牛乳之滋養質，實勝於生母之乳者」；[99] 1924 年，陳卓人醫師却說：

> 牛乳一物，現在吃的人漸次多起來，所以稍為大些的地方，都有發賣。一般人迷信牛乳是獨一無二的滋養品，對於小孩也有濫用的傾向……現在有許多母親，因為自己沒有乳汁，或不得已的時候，給小孩吃牛乳的很多；甚至於有母乳吃的小孩，也勸他吃牛乳。他們的意思，好像牛乳對於小孩比母乳還要好的樣子。然而在我們有醫學知識的人看起來，非但不能贊成，而且要大大的反對。[100]

至 1920 年代末期，筆名達如的作者仍感嘆：「近年來，我國有許多婦女，自己本來持清潔而又充足的乳汁，卻買牛乳哺育小兒，這是一項頂壞的習慣。」[101] 由此可見，當時有婦女相當迷信牛乳的功效，且城市中供應牛乳的商家也不在少數。以上海爲例，1927 年僅公共租界就有 33 家；1929 年，華界也有 51 家。[102] 其中，洋商以「可的牛奶」爲首（見圖四）；華資則以上海畜植公司、自由農場、生生牛奶公司等，規模較大（見圖五）。1930 年代，僅這四家牛奶棚，其日產量即超過 20,000 磅。[103]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農場在杭州也有牛奶棚。[104] 至於北平，1935 年時，也有鮮乳廠 20 餘家，乳牛百餘隻。[105]

---

99 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 124。

100 陳卓人，〈牛乳和人乳的比較〉，《婦女雜誌》，卷 10 期 3，頁 568-570。

101 達如，〈育嬰的法則〉，《婦女雜誌》，卷 15 期 10，頁 39。

102 不著撰人，《上海工部局衛生清冊(1927)》（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頁 27b；上海特別市衛生局，〈上海牛奶棚之調查〉，見上海特別市衛生局編，《社會月刊》，卷 1 期 6（1929 年 6 月），頁 3。

103 陳柏生，〈上海牛奶業慘痛史〉，見陸堅心等編，《二十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冊 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頁 163-164。

104 偉，〈用鮮牛乳哺育嬰兒的方法〉，《家庭星期》，卷 2 期 15，頁 235。

105 林景亮，〈北平鮮牛乳之分析及其改善〉，《學藝》，卷 14 期 2（1935 年 3 月），

圖四　可的牛奶廣告

資料來源：《申報》，1931 年 2 月 28 日，本埠增刊，版 2。

圖五　近代上海的鮮奶廣告

資料來源：上圖，《良友畫報》，期 1（1926 年 2 月），頁 5。下圖，《申報》，1931 年 3 月 3 日，本埠增刊，版 1。

當時鼓吹以牛乳哺餵嬰兒者，多半強調其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無機物的比例相稱，所以「可以當作嬰孩的基本食物」。[106] 而一些商人也看準消費者的心理，以及時人對於「強種」的渴望，將牛乳的營養功效與未來國民的健康作連結，大打廣告。如「可的牛奶」就以中國地圖爲背景，加上「憔悴之嬰孩，即來日面黃肌瘦之男子，肥胖之嬰孩，即來日傀〔魁〕偉強壯之男子」的標題，[107] 暗示其產品具有強國強種的功效。

除了以牛乳代替人乳外，羊乳也是常見的替代品。《本草綱目》記

頁 199。

106 孫君立，〈牛乳和牛乳製品〉，《婦女雜誌》，卷 16 號 12（1930 年 12 月），頁 81、83。

107 「可的牛奶」廣告，《申報》，1928 年 11 月 3 日，本埠增刊，版 1。

載：羊乳味甘，性溫，無毒，主治寒冷虛乏。[108] 在黑龍江省境內，當婦女因生活忙碌、或缺乏乳汁無法哺乳時，常以山羊乳哺餵嬰孩。當地的山羊經過馴養後，多能通曉人性，只要聽到嬰兒啼哭即產生條件反射，急忙竄到炕上，伏在嬰兒面前讓其吮奶。如果嬰兒不是因爲飢餓啼哭，不去吸奶，山羊還會久臥不動，靜靜等候。迨嬰兒飽食吐出乳頭後，山羊又會回到地上。當地人十分注意山羊平時的飲食衛生，其跪臥處也多能保持潔淨。[109] 時至近代，甚至有人認爲羊乳的營養成分勝於牛乳。[110] 抗戰時期，因「市售牛乳太昂，代乳粉又粗濫不堪適用」，所以一位家住北京的人士想到以山羊乳代替，結果成效良好，他曾在雜誌中大力宣傳，指出山羊易於飼養，其乳不含結核菌，營養成分不亞於牛乳，且價格低廉，「可惜一般人祗知濫用牛奶及代乳粉」。[111] 不過，也由此反證：當時中國人還是比較習慣以牛乳或代乳粉等代替母乳。

2. 飲用鮮牛乳的風險

既然多數人都認同牛乳的功效，那麼到底是新鮮的牛乳較好？還是經過處理的罐頭乳品較適合嬰孩呢？問題的核心在於鮮乳是否安全衛生。因爲「自牛身擠出乳汁，以至入人口腹，不知幾歷無窮之穢濁。」[112] 再加上牛乳本身營養成分高，極有利於細菌孳生繁衍，所以有人說：「一切食料中，要算牛乳最常與疾病有密切連帶的關係。」[113] 在近代以前，歐美即有不少因喝生牛乳而導致嬰兒腹瀉致死，或因而染患結核病的例子。不過，這些問題在 1890 年代後期，當巴氏消毒法(Pasteurization)被發明後，已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20 世紀初，美國就有醫師和牛奶供應商聯合組成監督機構，篩選健康的乳牛，以合乎衛生標準的程序擠乳，再以巴氏消毒法處理牛奶，經過裝瓶、冷凍等技術，透過便捷的交通，

108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獸部一‧羊〉，頁 2731。
109 里村編輯，〈育嬰民俗風情博覽〉，《母嬰世界》(2002 年 2 月)，頁 32。
110 沈軼群，〈牛乳之研究〉，《婦女雜誌》，卷 1 號 10 (1915 年 10 月)，頁 6。
111 李永陽，〈戰時育兒與山羊乳〉，《婦女雜誌》，卷 6 期 5 (1945 年 6 月)，頁 30。
112 不著撰人，《上海工部局衛生清冊(1908)》(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頁 2。
113 孫君立，〈牛乳和牛乳製品〉，《婦女雜誌》，卷 16 號 12，頁 82。

提供消費者更有保障的鮮乳。[114]

然而，這些確保鮮乳安全衛生的條件和技術，在 20 世紀初的中國並不普遍。1926 年陳卓人醫師在參觀過東京牧場後，曾感慨說：當時中國經營牧場者多缺乏學識，資金設備也不足，故有關牛隻清潔、牛房消毒、擠乳時的衛生等，均不甚注意。[115] 因此，想要在中國飲用安全衛生的鮮牛乳，機會不大。清末時，上海工部局已定期派人檢查租界內的牛奶，但仍時常檢驗出不合格的鮮乳。[116] 1929 年 9 月，國民政府衛生部也實施〈牛乳營業取締規則〉，對鮮乳的比重、成分、新鮮度、容器，以及牛隻是否健康、營業者及牧場工作者不可患有傳染病等，作詳細規定，以保障民眾喝鮮乳的安全。[117] 在廠商方面，自由農場也標榜其鮮乳經過蒸汽殺菌。[118] 但市面上的鮮乳似乎仍無法令消費者安心。1944 年，適逢生產的葉子，因爲自身乳汁分泌不足，正在爲兒子尋找代乳品，在幾經觀察後她得出結論：中國人普遍不講求衛生，所以「鮮牛奶是靠不住的」。[119] 雖然這項缺點可透過在家煮沸鮮乳來加以改善，但這也可能把牛乳中有益身體的消化酵素及「維達明」(vitamin)等一併消滅，以致牛乳的營養價值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造成嬰兒發育不良。[120]

喝鮮乳除了要擔心有細菌混入外，還得提防廠商摻和雜物，魚目混

---

114 所謂「巴氏消毒法」，是利用較低的溫度消毒，如：60℃，消毒 20 分鐘；或是 65℃，消毒 15 分鐘。這種低溫消毒法的優點是，既可保留大部分的營養素，又可將多數的細菌殺滅。由於結核分枝桿菌相當怕熱，煮沸 5 分鐘，或在 60℃的環境下，20 分鐘即死，故用巴氏消毒法也可將之殺死。相關討論請參見 George D. Sussman, *Selling Mothers' Milk*, p. 128; Jacqueline H. Wolf, *Don't Kill Your Baby: Public Health and the Decline of Breastfeeding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1), pp. 1, 59-64, 172-174. 左如梅等編著，《公共衛生學與公共衛生護理學》（臺北：南山堂出版社，1996），頁 442。

115 陳卓人，〈牛乳和人乳的比較〉，《婦女雜誌》，卷 10 期 3，頁 569。

116 不著撰人，《工部局衛生清冊(1908)》，頁 30。

117 衛生部，〈牛乳營業取締規則〉（1928 年 10 月 20 日公布，1929 年 9 月 1 日施行），見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冊 40（合肥：黃山書社，1999），頁 242。

118 「自由農場牛奶」廣告，《申報》，1928 年 11 月 3 日，本埠增刊，版 1。

119 葉子，〈育嬰記〉，《婦女月刊》，卷 5 期 5，頁 27。

120 陳卓人，〈牛乳和人乳的比較〉，《婦女雜誌》，卷 10 期 3，頁 508-510。

珠。如 1908 年上海工部局的醫官就提到：當時有商人在鮮奶中摻水，或投入「荳〔豆〕腐漿」，並以此爲「作弊祕密」。[121] 可見，早在清末就有牛乳商人看準公共租界的牛乳市場，而在鮮乳中加入雜質，圖謀暴利。隨著喝牛乳的人愈來愈多，鮮乳的市場擴大，造假的手法也推陳出新，包括加入清水、澱粉、腐敗的陳乳，或是摻和米汁、豆漿、脂肪等，以增加牛乳的分量，甚至還有商人爲了要避免牛乳腐敗而加入防腐劑。爲了促使大眾注意牛乳的衛生，雜誌上經常教導民眾如何鑑別牛奶是否摻假。[122] 有的作者則直接建議：由於市售牛乳多不可靠，所以「最好到各衛生機關去定，包定每月多少錢，每日送多少，既新鮮又清潔，較爲妥當。」[123] 生產後無乳可餵的素人，醫師也不建議她使用鮮牛乳，因爲怕牛隻有病，自己又不會檢查。[124] 由這些作者的現身說法可知，當時的確有不少醫師和媽媽們，對於市面上的鮮乳存有疑慮。正因爲飲用鮮乳有如此多的顧慮，才爲代乳粉帶來大量的商機。

（二）「無異母乳」的代乳粉

餵母乳的優點，固然自 18 世紀以來即廣獲專家推崇，但 19 世紀中葉後，美國婦女餵母乳的比例卻逐漸下滑；而與此互爲消長的，則是 20 世紀以後，瓶哺人口的逐漸上升。這一結果，是多重原因所造成的。19 世紀末以後，當醫界正津津有味地討論細菌論(germ theory)的同時，女人也開始質疑自己的胸部及乳汁是否乾淨？總是擔心乳汁不足的媽媽們，則爲了嬰兒的健康而苦尋良方。而隨著人們對浪漫婚姻的追求，女人的乳房逐漸變成性的特徵，不再專屬於嬰兒。這些因素，促使當時正開始投入職場，並積極追求現代化的母親們，迅速地做出以奶瓶取代乳房的決定；而生母或奶媽哺乳的古老爭議，也被胸哺或瓶哺的新議題所取代。[125]

121 不著撰人，《工部局衛生清冊(1908)》，頁 30。

122 盛文，〈牛乳的成分和品質的檢驗法〉，《婦女雜誌》，卷 17 號 9（1931 年 9 月），頁 101；扶島，〈牛奶攙假的鑑別法〉，《新婦女》，期 6（1940 年 11 月），頁 8。

123 波兒，〈談談哺乳〉，《婦人畫報》，期 39，頁 4-5。

124 素人，〈母親的經驗〉，《婦女月刊》，卷 2 期 2（1942 年 7 月），頁 35。

125 Jacqueline H. Wolf, *Don't Kill Your Baby*, pp. 10-12. Marilyn Yalom, *A History of the*

值得注意的是，在瓶哺比例逐漸增加的過程中，醫師的專業意見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儘管許多醫師及育嬰手冊上都鼓勵餵母乳，但他們也或多或少同意：只要在醫師的監督或指導之下，使用乾淨衛生的代乳品進行瓶哺，是可以被接受的。這種態度，隨著美國婦女逐漸時興到醫院生產，並在住院期間接受院方的母職課程後，有越來越多的嬰兒被施以瓶哺。因爲，醫院的產後課程中，經常會爲媽媽們準備奶瓶和代乳粉，彷彿在暗示著「瓶哺和胸哺一樣好」的觀念。[126]

1. 代乳粉登場

當然，若要實施瓶哺，勢必要有相應的代乳品配合才行。儘管鮮乳的消毒技術已在 19 世紀獲得重大突破，但不利於長期保存與攜帶的缺點，仍使得許多醫師與科學家殫心竭力地尋求其他代乳品。1856 年加了糖的半乾燥牛乳——罐裝煉乳(condensed milk)首次在美國出現，其使用雖較鮮乳方便，但過多的糖卻不利於嬰兒。1885 年又有人發明罐裝淡奶(evaporated milk)，它的形態和製作過程都和煉乳一樣，只是未添加糖分，可算是較佳的代乳品，但開封後容易腐敗，有其缺點。與此同時，粉狀代乳品則取得長足的發展。1868 年，添加了小麥、麵粉、糖等混合物的代乳粉開始上市，並在 1870 年代擴及歐洲、美洲及澳洲等地。而將牛奶乾燥成奶粉的技術，據說在 1832 年由俄國化學家 M. Dirchoff 首度發現，此後在多位科學家的逐步改良下，至 20 世紀以後大量應用於商業生產，成爲母乳的重要替代品。由於這些代乳品都不需再煮沸，且攜帶方便、易於貯存，因此很受母親們歡迎。[127] 據統計，19 世紀末西方市場約出現 20 餘種不同的代乳粉品牌。[128]

這種新式的罐裝奶品，至遲在 1880 年代初期，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報

Breast, p. 227.

126 Rima D. Apple, *Mothers and Medicine: A Social History of Infant Feeding, 1890-195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151-168.

127 Jacqueline H. Wolf, *Don't Kill Your Baby*, pp. 10, 158-168.

128 史都華．李．艾倫著(Stewart Lee Allen)，朱衣譯，《惡魔花園：禁忌的美味》，頁 192。

紙上。1883 年上海老德記藥房在《申報》所刊登的廣告中，就有「功勝眞乳」的「小兒代乳粉」。[129] 1910 年代，這類廣告在報章雜誌上的出現頻率漸增，至 1920 年代以後大量湧現。儘管我們無法確知這些代乳粉的實際銷售數字，但其廣告之能夠一再出現於各報章雜誌中，除了顯示出廠商資本雄厚外，也有可能是其行銷策略成功，市場拓展的結果。抑且，從當時的一些資料中也可看出，這些新式代乳品的確在中國的哺育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1937 年林景亮在調查北平的鮮乳業時，就曾經指出：當時中國每年進口不少煉乳、奶粉；而北平的「中等家庭幾無不用煉乳或奶粉以餵嬰孩者」；[130] 1943 年上海的《企業周刊》也報導：「戰前煉乳、奶粉進口年達數千萬元，漏巵殊足驚人。」[131] 雖然這些資料無法證明進口的全是嬰兒所使用的代乳品，且亦未提及使用的時機是在斷奶前或斷奶後，但至少可以得知，當時的確有不少人選擇罐裝代乳品哺餵嬰兒。

2. 醫師的推薦

就如同美國的市場一樣，這些新式代乳品在中國的拓展過程中，也有賴於醫師的推波助瀾。在本文第二節，曾列舉多位醫師撰寫推崇母乳的文章。其中，甚至有醫師用「應該」等強烈字眼，要求婦女必須親自哺乳。然而，這些醫師也多半提到：當母親罹患疾病或因爲就業而不能哺乳，且無法雇請奶媽時，不妨使用代乳粉。1914 年，一名自稱「十三世專門婦幼科」的鄭樂山醫師，就爲愛蘭百利代乳粉做廣告。[132] 1929 年《申報》上也有一則醒目的廣告，原來是惠民奶粉刊登某陳姓黨國要人的感謝函，文中提及：其子因七月早產，弱不堪言，幸得產科女醫陳仲芬與梁秀珍兩位醫師，建議以惠民奶粉哺育，才得以安然成長。[133] 由此推測，當時可能有一些產科醫師與代乳粉廠商合作，或爲其廣告，或

129 「老德記藥房」廣告，《申報》，1883 年 1 月 1 日，版 4。
130 林景亮，〈北平鮮牛乳之分析及其改善〉，《學藝》，卷 14 期 2，頁 199。
131 惠，〈福民乳品公司〉，《企業周刊》，卷 1 期 18（1943 年 5 月），頁 11。
132 「愛蘭百利代乳粉」廣告，《申報》，1914 年 11 月 1 日，版 10。
133 「惠民奶粉」廣告，《申報》，1928 年 11 月 4 日，版 9。

在院中直接推薦產婦使用。1931 年，廣州的《大眾醫刊》也有文章專門介紹代乳粉的成分及製造過程，並指出：「在難得牛乳的地方，或是牛乳不信用的地方，寧可用這種代乳粉爲妥。」作者甚至在文中直接指明：澳洲產的勒吐精、美國製品特賴可，都是可以信賴、且中國人常用的純質乾牛奶。[134]

值得注意的是， 1941 年行政院衛生署所出版的衛生教育文宣中，也同意若遇母乳不足時，可使用獸乳或代乳粉進行人工哺育；惟「各種乳粉成分不一，嬰兒必須經醫師檢驗，方能斷定其需要。」[135] 在此，醫師在哺育行爲中的關鍵性角色，再次受到肯定，其影響力甚至及於政府。此外，也有醫師直接建議無法餵乳的產婦，寧可選擇代乳粉，也不要餵鮮牛乳或羊乳，以免這些動物有病，危及嬰兒。[136] 1948 年，南京的《醫潮》曾有文章詳細介紹如何選擇牛乳或代乳粉進行瓶哺。[137] 同年，蘭州的《現代婦女》也刊文介紹奶粉的好處：

> 當你不能得到乾淨和好的鮮奶時，奶粉是特別的有用。在夏天，或者你沒有適當的地方保存鮮奶，或者在外面旅行，或者住在炎熱的地帶，都可利用奶粉。奶粉比鮮奶更易消化些，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對某些嬰孩似乎更為適宜。[138]

這雖是一篇譯自國外的文章，但對於崇尚西方科學，且未必有冷藏設備的「現代婦女」而言，想必定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故雜誌社才認定它有刊登價值。

3. 行銷的手法

代乳粉所以能在中國的哺育市場站穩腳步，除了有專家的默許與推

134 偉，〈談談代乳粉〉，《大眾醫刊》，期 17（1931 年 12 月），頁 15-16。筆者按，文中說的美國特賴可乾牛奶，指的應是大力果乾牛奶(Dryco)，其廣告經常出現於報章雜誌上。

135 行政院衛生署，〈嬰兒及幼童之營養〉，《婦女共鳴》，卷 10 期 5，頁 39。

136 素人，〈母親的經驗〉，《婦女月刊》，卷 2 期 2，頁 35。

137 丁寶鎬，〈人工哺乳〉，《醫潮》，期 2（1948 年 2 月），頁 16。

138 R. C. Jemesbury 原著，左平譯，〈人工哺育的幾個普通法則〉，《現代婦女》，卷 11 期 2（1948 年 2 月），頁 23。

薦外，廠商的促銷手法，也不容忽視。

就筆者所見，這些標榜著來自西方先進國家，具有悠久歷史的代乳粉廠商，[139] 除了運用贈送育嬰手冊，或鼓勵讀者免費索取試用品，[140] 以及利用健康寶寶的照片吸引消費者外（見圖六），其廣告手法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那就是大多數的代乳粉都肯定母乳的功效，並強調其產品已經過科學改良，成分幾乎「與母乳無異」，使消費者安心使用。這種廣告手法，除了因爲母乳的益處早已獲得醫界肯定之外，也與國外的經驗有關。20 世紀初，雀巢食品就在美國的雜誌上這麼說：「如果可以的話，請自己哺乳」，接著才說：「如果無法餵母乳的話，請給寶寶最接近母乳的雀巢食品。」[141] 同一時期，中國也出現類似的廣告手法。1913 年愛蘭百利代乳粉就宣稱其產品已經改良，「滋養之富，消化之易，誠與人乳無異」；而且，該公司還依照不同年齡的嬰兒需求，研製出不同成分的一、二、三號代乳粉，使其成分亦如母乳般，可隨嬰兒成長而有所調整，並預爲斷乳及添加副食品做準備。[142] 此後，不少代乳品的廣告都有類似的訴求，如 1923 年勒吐精代乳粉廣告，就把「此粉之成分與人乳無異」等字樣列在文首；[143] 1930 年該廠商在《醫學周刊集》上的廣告也說：「母乳爲嬰兒之天然惟一食品」，並且將其產品沖調後的成分與母乳互相對照，以證明所言屬實（見圖七）。這種強調代乳粉成分與母乳類似的廣告潮流，直到 1940 年代都很常見。[144]

139 愛蘭百利奶粉、企公老牌牛奶、葛蘭素奶粉均標榜自己是歷史悠久的英國廠商。寶華乾牛奶也標明自己是美國廠商。「愛蘭百利代乳粉」廣告，《申報》，1914 年 1 月 3 日，版 14；「企公老牌牛奶」廣告，《東方雜誌》，卷 10 號 1（1913 年 7 月）；「葛蘭素奶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9 期 11（1923 年 11 月）；「寶華乾牛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5 期 6（1929 年 6 月）。以上廣告除《申報》外，均未標明頁碼。

140 「愛蘭百利代乳粉」廣告，《申報》，1913 年 3 月 7 日，版 9；「勒吐精代乳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9 期 3（1923 年 3 月）；「惠民奶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14 期 4（1928 年 4 月）。以上廣告除《申報》外，均未標明頁碼。

141 Jacqueline H. Wolf, *Don't Kill Your Baby*, p. 163.

142 「愛蘭百利代乳粉」廣告，《婦女時報》，期 9（1913 年 2 月），廣告頁無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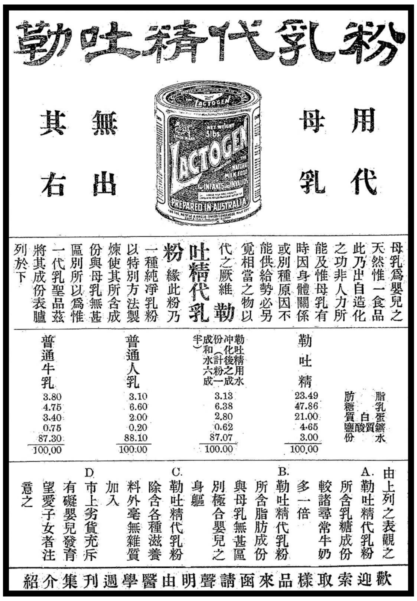
143 「勒吐精代乳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9 期 9（1923 年 9 月），廣告頁無頁碼。

144 以下廣告，均標榜其產品成分與母乳相同或相近，如：「好立克麥精牛乳粉」廣告，

圖六　牛欄牌肥兒代乳粉廣告

圖版來源：《良友畫報》，期 130（1937 年 7 月），頁 55。

圖七　勒吐精代乳粉廣告



資料來源：「勒吐精代乳粉」廣告，《醫學周刊集》，卷 3（1930 年 4 月），廣告頁無頁碼。

除了標榜成分接近母乳之外，廠商也深諳近代中國人迷信醫學專業，不僅自誇其產品深獲各國醫家讚賞，甚至還找醫師為其廣告。再者，也有聲稱其產品已通過醫學、化學、獸醫學及微生物學等相關學科的檢驗，[145] 以增加其產品的可信度及專業性。此外，代乳粉廠商還針對鮮乳

《婦女雜誌》，卷 14 期 5（1928 年 5 月）；「寶華乾牛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5 期 6（1929 年 6 月）；「大力果乾牛奶」廣告，《申報》，1931 年 3 月 31 日，版 6；「美女牌代乳粉」廣告，《上海婦女》，卷 1 期 1（1938 年 4 月）；「百祿牌牛奶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4 期 1（1943 年 1 月）。以上廣告，除《申報》外，均未標明頁碼。

145 「企公老牌牛奶」廣告，《東方雜誌》，卷 10 號 1（1913 年 7 月）；「寶華乾牛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5 期 7（1929 年 7 月）；「克寗乳粉」廣告，《女聲》，卷 1 期 20（1933 年 7 月）。以上廣告均未標明頁碼。

易生細菌、攜帶不便、價格昂貴等缺點，提出代乳粉的製作過程衛生安全，使用簡易、攜帶便利等優勢，[146] 並宣稱只要少量代乳粉，即可沖調出大量牛奶，如寶華乾奶粉就說：一罐 12 兩的奶粉，可沖調 3 夸脫(quart)的牛奶，相當經濟。[147]

由於代乳粉必須經過沖調方可使用，且多爲國外進口，對許多母親而言，難免有使用上的疑問。因此，以「廣惠全民」自詡的華資惠民奶粉，不僅強調其產品「深合華人體質」，甚至還雇用女看護，免費提供到府解說使用之法的服務，[148] 以爭取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另外，也有廠商洞悉少數婦女之不願意哺乳，可能是爲了怕容顏衰老，身材變形所致，故特別強調其產品可使「爲母者，早得斷乳，葆〔保〕其眞元，不致容顏未老先衰，由是而琴瑟好合，伉儷恒存。」[149] 1934 年，勒吐精代乳粉更搭上美女月份牌的風潮，[150] 一改過去多數奶粉所使用的母嬰圖像，改成穿著新式緊身花邊旗袍、身材窈窕、頭髮卷燙的摩登女性（見圖八）。這些畫風精緻、賞心悅目的圖片，無意中也透露其產品訴求的消費群，主要是中上階層、且較能接受新式或外來事物的摩登母親；同時，也暗示婦女使用代乳品之後，能使容顏依然年輕、美麗，且身材窈窕。這種廣告訴求，或許也能從「美女牌代乳粉」的品牌名稱中一窺奧祕！

---

146 「熊牌衛生牛奶」廣告，《東方雜誌》，卷 8 號 7（1911 年 7 月）；「寶華乾牛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5 期 8（1929 年 8 月）；「百祿牌牛奶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4 期 1（1943 年 1 月）；「好立克麥精牛乳粉」廣告，《婦女雜誌》，卷 14 期 5（1928 年 5 月）。以上廣告均未標明頁碼。

147 「寶華乾牛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5 期 6（1929 年 6 月），廣告頁無頁碼。

148 「惠民奶粉」的這些廣告，出處如下：《婦女雜誌》，卷 14 期 4（1928 年 4 月），廣告頁無頁碼；《申報》，1928 年 11 月 2 日，本埠增刊，版 2；《申報》，1929 年 1 月 15 日，版 13。

149 「企公牌牛奶」廣告，《申報》，1915 年 5 月 1 日，版 11。

150 「月份牌廣告」，是指跨越 20 世紀上半葉，而以 1920、30 年代為鼎盛時期的一種印有月份年曆的廣告畫。其畫面內容，早期是延續中國木版年畫的傳統，內容多為古裝仕女人物、歷史故事、戲曲傳說、吉慶圖案等民俗題材，後來則出現大量的時裝美女，至 1925 年以後，更隨著緊身旗袍的流行，使得這些穿著新式的旗袍美女，成為廣告月份牌的主角。見張燕風，《老月份牌廣告畫（上卷：論述篇）》（臺北：漢聲雜誌社，1993），頁 64-80。

圖八　不同時期代乳粉廣告中的婦女形像

圖版來源：左圖：「寶華乾牛奶」廣告，《婦女雜誌》，卷 15 期 8（1929 年 8 月），廣告頁無頁碼。右圖：「1934 年勒吐精代乳粉」廣告，張燕風，《老月份牌廣告畫（上卷：論述篇）》（臺北：漢聲雜誌社，1993），頁 38。

四、母親的哺育抉擇

1929 年上海《婦女雜誌》曾援引潘光旦(1899-1967)的言論指出：「晚近婦女運動影響所及，女子往往視自乳爲畏途。而逐利之商人，於牛羊乳質之外，復巧製種種代乳粉、乾牛奶之類，以迎合其苟且偷安之心理，此推彼挽，相習成風。」[151] 就潘光旦所言，當時似乎有許多媽媽不願親

151 沈美鎮，〈新女性與幼稚教育〉，《婦女雜誌》，卷 15 號 11（1929 年 11 月），頁 20。

自哺乳，尤其是那些婦女運動的追隨者，以致代乳粉、乾牛奶等產品，能夠大行其道。然而，這是事實嗎？對近代的婦女而言，她們又是如何選擇理想的哺乳之道呢？我們不妨從她們自己的言論中尋求答案。

1915 年出身於上海中產家庭，曾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主修聲樂的張蓉珍，在抗戰時家中依然雇有女傭爲其煮飯，可見，她的經濟能力不差。1938 年她在醫院誕下長女，隨即親自哺乳；後來，她又陸續生下兩個女兒，同樣自己餵奶。[152]

1918 年出生於杭州書香門第，曾接受 10 年私塾教育的高誦芬，夫家爲門當戶對的名門望族，甚是富裕。每次生產，丈夫都要爲她請一個特別護士隨侍在旁，直至雇到奶媽爲止。1942 年她懷有長子，丈夫買了 10 多本新式育兒書籍給她看。由於「新式育兒書上說了種種餵母乳的好處，於是，我就一心想等孩子出生後不怕苦，自己餵奶」。爲了將來能順利哺乳，她曾照著育兒書籍的教導，每日進行乳房護理。可惜，天不從人願，產後缺乳的她，只好雇用奶媽。不過，健康合適的奶媽不易尋得，只好先讓特別護士餵小孩克寧奶粉，以補充母乳不足之處。等奶媽找到後，才停止使用。此後，她又生了 3 個孩子，都是依此模式。[153]

筆名素人的婦女，主修教育，曾在課堂上讀過兒童學、保育學等專業知識，原本她就知道「對於小孩子最好是母親的奶，其次是奶媽的奶，再其次才是代乳粉」。1942 年，因剖腹產而身體虛弱，乳汁分泌不足，秉持著「醫師的建議一定比我高明」的想法，她接受醫囑，雇用奶媽。然而，她也面臨找不到合適奶媽的痛苦，轉而採取醫師的第二建議：先讓小孩喝代乳粉。不過，她對到底要餵多少分量的問題感到很困擾，因爲「代乳粉雖然有分量表，但那是外國人的分量，中國人用他，還要自己觀察情形，小心調整。」兩天後，嬰兒出現消化不良的情況，她便自行減少分量；結果，孩子不斷啼哭，好像很餓的樣子，果不其然，孩子

152 羅久蓉訪問、記錄，〈張蓉珍女士訪問紀錄〉，見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羅久蓉等記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頁 20-21。

153 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頁 358-365。

體重減輕了，她只好回醫院請教醫師，乖乖遵照醫師的指示餵養小孩，就這樣來來回回好幾次，直到奶媽找到了，孩子也適應了，她的生活才步上軌道。[154]

另一名作家葉子，在 1944 年湘桂撤退的時候，在貴州誕下一名男嬰，由於乳量過少，只好放棄餵母乳；在兵荒馬亂的生活中，她請不到奶媽，只得使用代乳粉：

> 那時在後方奶粉如鳳毛麟角，珍貴異常，只好請朋友在各拍賣行廣事搜羅。後來，把我們的經濟力全部購置了奶粉，以為這一個重大的問題可以解決了。誰知小孩剛剛吃了一個多月的奶粉，他便忽然嘔吐起來（我的餵法始終是按著醫師指示的）……後來竟像中毒一樣，四肢及唇舌都不能動作，經過了兩天的掙扎，他便死亡了。

抗戰勝利後，她又誕下第二子，在幾經波折後，才找到一個不盡如意的奶媽。爲了能讓孩子有足夠的奶吃，她不僅爲奶媽加薪加菜，甚至還親自爲她烹調，親眼看她進食。但奶媽仍不知足，葉子只好試著給孩子喝代乳粉，但二兒子同樣無法適應代乳粉。還好，到了斷奶期添加副食品後，孩子的狀況逐漸轉好，葉子的夢魘總算結束。[155]

另一位職業婦女章繩以，也在 1940 年著文提倡餵母奶，並以自己當年因不願放棄工作，而未能親自哺乳的慘痛經驗現身說法，她說：「筆者小兒之死，即因未吃母乳缺乏抵抗力」所致；在抱憾的同時，她也不忘提醒婦女：「母親一滴乳，可以爲國家造就一個健全的國民。其關係豈淺尠哉？」[156]

從上述的例子看來，當時有不少受過教育、且有能力雇奶媽或使用代乳粉的婦女，在醫界大力鼓吹的環境下，對母乳抱持肯定的態度，並願意親自哺乳；甚至還有人認爲：餵母乳有助於養成健全國民，將母乳

---

154 素人，〈母親的經驗〉，《婦女月刊》，卷 2 期 2，頁 34-36。

155 葉子，〈育嬰記〉，《婦女月刊》，卷 5 期 5，頁 28-29。

156 章繩以，〈貢獻給做母親的小禮物〉，《健康家庭》，卷 2 期 6（1940 年 9 月），頁 4。

哺育與愛國行爲連結起來。只有當乳汁不足時，母親們才會在醫師的建議下，依次雇用奶媽，或選擇代乳粉。再者，即使是受過教育的婦女，也常對代乳粉的使用感到陌生與不安，故醫師與其他專業人員，成了不可或缺的諮詢者與指導者。不過，仍有少數嬰兒因無法適應代乳粉而死亡。由此可見，自清末以來鼓吹婦女親自哺乳的風氣，在近代的確擁有不少支持者，其中，不乏家境富裕的知識婦女。

（二）價格比較

對家境寬裕的婦女而言，哺乳方式的選擇，除了無可抗拒的健康缺陷外，個人信念或許是決定因素。但就大多數的庶民看來，價格才是他們的考量重點。

以奶媽而言，許多資料都提及：過去只有大戶人家才雇用得起。不過，1935 年上海的奶媽，其每月薪資只有 6-10 元左右；同一時期，上海女教師平均薪資 50 元，女工則平均 15 元。[157] 由此看來，雇用奶媽似乎不是太難。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傳統中國大多數的奶媽，都是雇至家中，除了每月的薪資外，主人還得供她食宿，並致贈禮物。1930 年一份南京警察廳公證的「乳娘介紹證據」中就載明：奶媽的報酬，除了每月 10 元的工資外，還包括春、夏、冬各季衣服六件以及首飾，而且必須在定工之後，先付 2 個月工資（見圖九）。高誦芬也曾回憶：當時雇主請奶媽，多在到職之初，即先做四季衣服送她，有時還要預付 3 個月的薪水；在孩子百日、斷奶、周歲時，主人得再送衣料或衣服，以及金銀飾物，並付給雙倍的工資。平日裡，每餐都要給她添魚、肉、蹄膀等菜，並在正餐之外再給她吃肉類點心，使她奶水增加。[158] 這在當時並非特例，前文所提的葉子就有類似經驗，[159] 可見雇用奶媽的花費，決不僅止於表面的薪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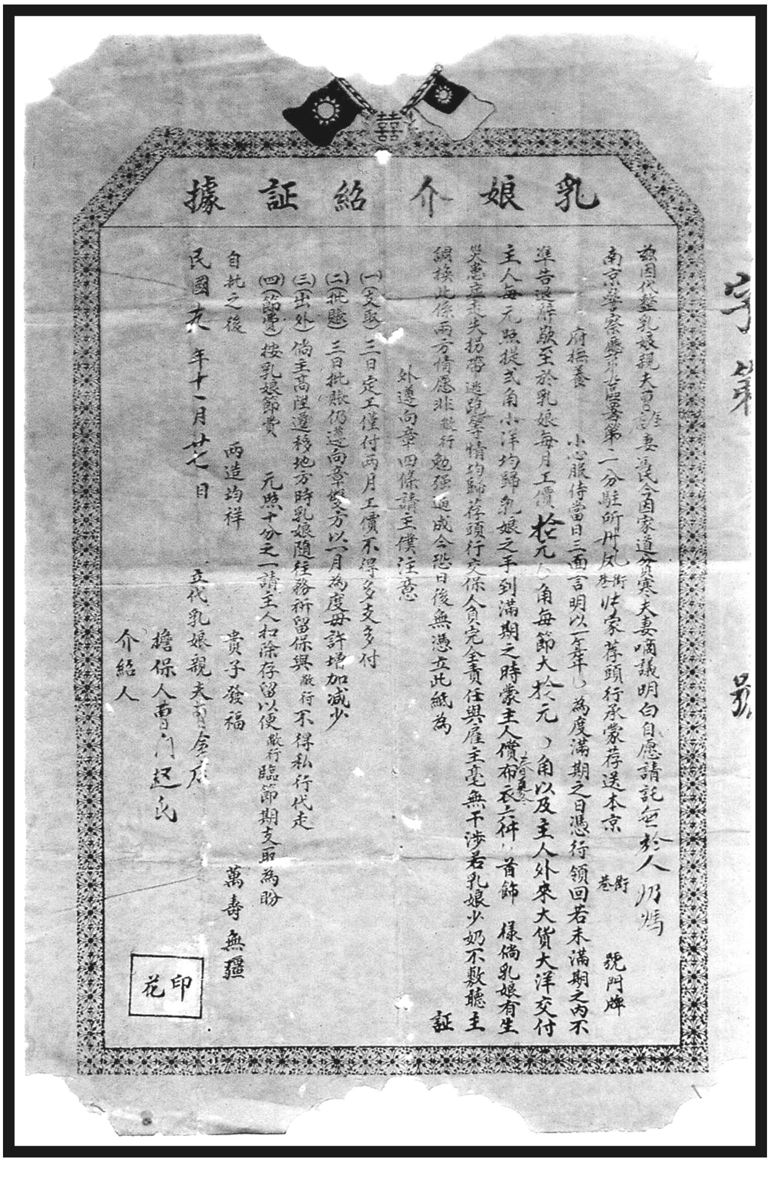
---

157 菊人，〈上海職業婦女生活概況（上）〉，《女聲》，卷 3 期 25（1935 年 4 月），頁 6-7。

158 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頁 356-359。

159 葉子，〈育嬰記〉，《婦女月刊》，卷 5 期 5，頁 29。

圖九　1919 年南京「乳娘介紹證據」



乳娘介紹証據

茲因代整乳娘親夫曹姓妻氏今因家道貧寒夫妻兩議明白自愿請託包於人 奶媽
南京警察廳第一區第一分駐所州凡街巷 張家薦頭行承蒙薦送本京 街巷 號門牌
府撫養 小心服侍當日三面言明以一年為度滿期之日憑行領回若未滿期之內不
準告退辭歇至於乳娘每月工價拾元 角每節大洋拾元 角以及主人外來大貨大洋交付
主人每元照提弍角小洋均歸乳娘之手到滿期之時蒙主人賞布衣 件 首飾 樣倘乳娘有生
災患疾走失拐帶逃跑等情均歸薦頭行交保人負完全責任與雇主毫無干涉若乳娘少奶不敷聽主
調換此係兩方情愿非敝行勉強迫成今恐日後無憑立此紙為 証
外邊向章四條請主僕注意
(一)(支取)三日定工僅付兩月工價不得多支多付
(二)(批賬)三日批賬仍遵向章按月支方以一月為度毋許增加減少
(三)(出外)倘主高陞遷移地方時乳娘隨往務祈留保與敝行不得私行代走
(四)(節賞)按乳娘節費 元照十分之一請主人扣除存留以便敝行臨節期支取為盼
自批之後 兩造均祥 貴子發福 萬壽無疆
民國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立代乳娘親夫曹金庭 擔保人曹門趙氏 介紹人
印花

資料來源：故紙堆編委會，《故紙堆》，丙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114。

再就鮮牛乳來看，傳統中國雖有使用牛乳的紀錄，但並未普及。近代在西方觀念的影響下，才成爲少數人的日常飲品及代乳品，而其價格並不便宜（見表二）。以 1900 年爲例，每 200 磅的米值 3 元 5 角，則每磅米爲 1.75 分；每磅牛肉也只值 1 角 3 分；而 1 瓶牛乳卻要 1 角 2 分。換言之，1 瓶牛乳的價錢可買將近 1 磅的牛肉與 6.8 磅的米（約 3.1 公斤）。況且，若以鮮乳餵養嬰兒的話，不可能每天只喝 1 瓶就足夠。1930 年代以後，雖然大城市中的牛奶棚增多，但價格仍非一般庶民所能負擔。1935 年曾調查北平市鮮乳業的林景亮就坦言：當時販售鮮乳的廠商雖較以前多，且價格亦比以前更廉，但實際生活中，仍只有富貴大戶以及一部分的中等人家能夠負擔得起。[160] 其他地方，可能也是如此。因爲，直到 1945 年仍有人感嘆：在「奶牛不多之中國，既然缺乏牛奶，或者價目過昂，非中下等人家所能支持。」[161]

表二　1900-1908 上海各項食物價值表

	牛肉 每磅	雞 每磅	蛋 每打	牛乳 每瓶	番薯 每擔	米 每 200 磅	洗衣 每 100 件
1900	1 角 3 分	1 角 4 分	1 角 2 分	1 角 2 分	1 元半	3 元 5 角	3 元
1905	1 角 7 分	1 角 6 分	1 角 4 分	1 角 4 分	2 元	4 元 8 角	3 元
1906	1 角 7 分	1 角 6 分	1 角 5 分	1 角 5 分	2 元	6 元 4 角	3 元
1907	1 角 9 分	1 角 8 分	1 角 6 分	1 角 6 分	2 元	8 元 4 角 5 分	3 元 5 角
1908	1 角 9 分	1 角 6 分	1 角 5 分	1 角 5 分	2 元 1 角 4 分	7 元 9 角	3 元

資料來源：「各項食物價目表」，不著撰人，《工部局衛生清冊(1908)》（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頁 43。

160 林景亮，〈北平鮮牛乳之分析及其改善〉，《學藝》，卷 14 期 2，頁 199。
161 冰凝，〈人工育兒經——採用科學的原理，利用土產的營養〉，《婦女月刊》，卷 4 期 4，頁 28。

至於代乳粉，價格也不太便宜。由於代乳粉多係國外進口，其價在平時已屬高昂；八年抗戰期間，又因貨源中斷，或屢遭不肖商人囤積，其值更貴。[162] 而且，雖然許多廠商都標榜使用代乳粉十分經濟，但仔細分析，卻未必如此。1937 年曾有人指出：當時醫家經常推薦的澳洲勒吐精代乳粉，1 罐 3 磅重，價錢約 6 元多，可沖淡牛奶 24 磅，若要沖出與鮮乳同樣濃度的，只能沖 16 磅。[163] 若以當時衛生署所建議的嬰兒食量而言，1 罐 6 元多的奶粉，若沖淡奶，可供 1 個月大的嬰兒吃上 12 天，若沖得和鮮乳同樣濃度的話，則只能吃 8 天；[164] 換言之，每個月必須花 15-23 元左右購買代乳粉；若是兩個月以上的嬰兒，則食量加大，費用更多。以同年北平、南京等大城市的小學教師而言，其月薪已較其他地方爲高，平均 42.5 元，僅嬰兒代乳粉即已消耗其收入之半。至於當年全國各省小學教師的平均收入，則僅有 10.7 元，[165] 根本不足以支付嬰兒一個月的代乳粉花費。

必須說明的是，儘管代乳品格並不便宜，但從時人「只有富貴人家才有能力使用鮮乳，中等人家則使用代乳粉餵養嬰兒」的言論看來，[166] 奶粉比鮮牛乳便宜，應是沒有疑問的。另一份 1937 年的資料則說：使用代乳粉的費用，比雇用奶媽低。[167] 由此推論，在一般的情況下，雇用奶媽的整體花費可能與鮮乳差不多，或稍高一些，而代乳粉則最爲便宜。但即使是如此，代乳粉仍只在中上之家才可能使用。畢竟，對大多數經濟力不甚寬裕的母親而言，倘若自己有充足的奶水，決不可能棄之不用，尤其在物資匱乏的抗戰期間，更是如此。1948 年，衛生署公布抗戰期間，針對幾個城市所進行的調查數據時指出：由於煉乳、奶粉、鮮牛羊乳等

162 惠，〈福民乳品公司〉，《企業周刊》，卷 1 期 18，頁 11。
163 偉，〈用鮮牛乳哺育嬰兒的方法〉，《家庭星期》，卷 2 期 15，頁 234。
164 1 磅約為 12 兩，24 磅合 288 兩，16 磅合 192 兩；一個月大的嬰兒每日約需 24 兩奶水，故 1 罐 3 磅的奶粉，沖調後可供嬰兒食用 8-12 天。
165 李朋，〈改善教師待遇與良師興國運動〉，《四川教育》，卷 1 期 6（1937 年 6 月），頁 40。
166 林景亮，〈北平鮮牛乳之分析及其改善〉，《學藝》，卷 14 期 2，頁 199。
167 偉，〈用鮮牛乳哺育嬰兒的方法〉，《家庭星期》，卷 2 期 15，頁 234。

價格昂貴，平民不易多得，因此有 90％的嬰兒係用人乳哺餵。[168] 雇用奶媽花費之高已如前述，故這 90％的人乳哺育，應以母乳占大多數。

結　　論

近代中國因外力侵逼，國勢陵夷，在「強國強種」的潮流下，兒童成爲繼婦女之後被重新發現的另一族群，而其所負的責任，也從明清時期的「興旺家族」，提昇爲「復興民族」的更高層次。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重視兒童思潮的影響下，人們對於兒童的教養態度，也由過去的「長者爲尚」轉變爲「兒童本位」的理念，兒童所受到的關注與愛護，已較傳統更進一步。爲了固本培元，如何哺育尚無生存能力的嬰兒，也屢屢在這波兒童熱潮中被提出來，成爲報章雜誌熱烈討論的話題。可見，這種帶有優生意味的民族主義，是促使近代重視兒童哺育問題的重要助力。

母乳是哺育嬰兒最自然、最簡省的途徑，所以自古以來即是人們餵養嬰兒的主要方式。時至近代，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哺餵母乳的行爲雖然依舊，但其內涵卻有了明顯的改變。首先，受到時代氣氛的影響，強國強種的訴求使人們體會到「健康之兒童乃民族之生機」，乃要求身爲「國民之母」的婦女們，必須積極負起哺育國族命脈的責任，親自哺餵母乳，以期嬰兒健康茁壯。這使得餵母乳的舉動，由原本純屬於私領域的母子親情，一躍而成爲公領域中婦女應盡的國民義務與愛國行動。就此而言，近代中外的政治發展雖有不同，但因政治因素而影響人們對哺餵母乳的看法，則有雷同之處。

其次，隨著現代醫學的發達，以及醫學權威的建立，當人們因對於兒童生理與母乳的成分更加瞭解，並配合「兒童本位」理念，進而提倡哺餵能適應嬰兒生理發展的母乳時，雖然行爲的表面依舊，但其內涵卻與過去不同。換言之，同樣是餵母乳，但近代在鼓吹母乳的時候，卻是披上一層西方醫學的外衣，重新包裝，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吸引知識分子

168 程美玉，〈我國嬰兒死亡率及死因之檢討〉，《中華醫學雜誌》，卷 34 期 2，頁 57。

的目光，並成爲深獲肯定的主角，甚至是養育健康國民的強種良方。

然而，社會上對於餵母乳的期望，卻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思潮相互衝突。因爲，餵母乳背後所意謂的，是即將被束縛於家庭中照顧嬰兒的不自由生活。在理想的奶媽不易雇請、潔淨的鮮乳不易獲得的情況下，如何哺育出健康的嬰兒，成爲那些有意獻身職業，以及因爲疾病、乳汁缺乏，甚或懼怕衰老、追求時髦而無法（或不願意）餵母奶的婦女們，所無法逃避的迫切問題。於是，嗅覺敏銳的商人，在中國找到了拓展版圖的商機。除了有藥商推出生乳藥之外，代乳粉的廠商更是動作頻頻。爲了搶攻這一灌溉民族幼苗的神聖領域，他們或是抬出「母乳最好」的金字招牌，或是宣稱產品已改良成「與母乳無異」的特點，一則藉以減少消費者對其商業動機的反感，二則彰顯其深諳嬰兒的營養需求；三則顯示其設備優良，故能以科學方法製出近似母乳的代乳粉。此外，代乳粉廠商也常標榜其產品曾經國內外各醫家推薦，甚或直接尋求醫師爲其代言，藉由醫師的權威，取信消費者。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提倡哺餵母乳的優點，或是警告鮮牛乳的風險，甚或是建議產婦以代乳粉替代母乳，醫師都在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 19 世紀末以後的美國。最後，甚至破壞了美國母乳哺餵的傳統，使嬰兒的哺餵出現醫療化與商業化的情形。[169] 相較之下，中國的醫師雖然利用著書撰文、實際看診，以及在政府衛生部門擔任職務等機會，使其對哺育方式的評價，影響國家育嬰教育的宣傳方向，並且改變部分婦女的哺餵行爲，甚至干涉了嬰兒的營養來源。不過，由於近代中國的乳製品業不若西方發達，以致鮮牛乳和代乳粉的價格始終不易平民化，再加上中國的上層社會仍時興雇用奶媽。因此，這些代乳品多半出現於通商大埠或富裕家庭；至於廣大的鄉村地區，以及爲數眾多的市井小民，主要仍是以哺餵母乳爲主。更何況，在醫學專家的大力背書下，餵母乳依舊是許多受過教育、且崇信西方科學的母親們，心目中最神聖、且對嬰兒最好的哺育行爲。

---

169 Rima D. Apple, *Mothers and Medicine*, pp. 151-169.

總之，就中國近代的哺育市場看來，胸哺（人乳）與瓶哺（代乳品）的競爭雖然存在，但僅限於城市裡的中上階層；抑且，兩者之間還存在互補作用。因爲，這些中上階層的母親們並非個個都請奶媽或使用代乳品，只有某些趕時髦、追求自由的新女性，或是當母親因故而無法親自哺乳，或是母乳不足，甚至嬰兒已至斷乳期時，才以瓶哺取代胸哺。換言之，就廣大的中國人口而言，哺餵母乳的觀念與行爲，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潮流。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元〕《鎮江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9。
〔明〕《姑蘇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正德元年刻本影印，1965。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
〔清〕《永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24 年補刊本影印，1983。
〔清〕文海，《衛生匯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清〕王士雄著，盛增秀主編。《王孟英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0。
〔清〕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二、報刊

《上海婦女》，上海：上海婦女社，1938-1939。
《大眾醫刊》，廣州：大眾醫刊社，1931。
《女子世界》，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1915。
《女子世界》，常熟：常熟女子世界，1903-1904。
《女聲》，上海：女聲社，1932-1933。
《中國婦女》，上海：中國婦女雜誌社，1939-1941。
《中華醫學雜誌》，北京：中華醫學會，1924-1958。
《四川教育》，成都：四川省教育廳，1937。
《民國日報》（上海版），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1985。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重印，1982-1987。
《企業周刊》，上海：企業周刊社，1943。
《老實話》，北平：老實話社，1934。
《東方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72-1973。
《社會月刊》，上海：上海特別市衛生局，1929。

《家》，上海：家雜誌社，1947。
《家庭星期》，上海：家庭服務社，1937。
《家庭醫藥》，南寧：家庭醫藥社，1947。
《健康家庭》，上海：健康家庭出版社，1937-1940。
《婦人畫報》，上海：婦人畫報社，1933-1937。
《婦女月刊》，重慶：婦女月刊社，1941-1948。
《婦女月報》，上海：上海婦女教育館，1935-1937。
《婦女世界》，廣州：協榮印書館，1941。
《婦女共鳴》，南京：婦女共鳴社，1929-1930。
《婦女旬刊》，杭州：中華杭州婦女學社，1917-1925。
《婦女界》，上海：蔡魯依發行，1940-1941。
《婦女時報》，出版地不詳：婦女時報社，1911-1917。
《婦女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1931。
《婦女雜誌》，北京：婦女雜誌社，1940-1941。
《教育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1948。
《現代婦女》，蘭州：現代婦女雜誌社 1948。
《盛京時報》，瀋陽：盛京時報影印組重印，1985。
《新婦女》，出版地不詳：新婦女月刊社，1945-1946。
《新婦女》，北京：新婦女社，1939-1940。
《學藝》，上海：中華學藝社，1935。
《醫事公論》，鎮江：醫事公論社，1934-1937。
《醫潮》，南京：醫潮社，1948。
《醫學周刊集》，北平：丙寅醫學社，1926。

三、專書

《上海工部局衛生清冊(1908)》。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
《上海工部局衛生清冊(1927)》。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上海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輯 6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丹波康賴編撰，趙明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遼寧技術出版社，1996。
史都華・李・艾倫著(Stewart Lee Allen)，朱衣譯，《惡魔花園：禁忌的美味》。臺北：時報文化，2005。
左如梅等編著，《公共衛生學與公共衛生護理學》。臺北：南山堂出版社，1996。
周一良，《鑽石婚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02。
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10。
金安平著，鄭至慧譯，《合肥四姊妹》。臺北：時報文化，2005。
姚昶緒編，余雲岫校，《胎產須知》。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
徐家楨、高誦芬，《山居雜憶》。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
張燕風，《老月份牌廣告畫（上卷：論述篇）》。臺北：漢聲雜誌社，1993。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9。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3。
郭我力編著，《新女性手冊》。上海：中國圖書編譯館，1940。
陸堅心等編，《二十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上海：進化社，1915年初版。
熊秉眞，《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熊秉眞，《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熊秉眞，《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冊40。合肥：黃山書社，1999。
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羅久蓉等記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研究近史所，2004。
Apple, Rima D. *Mothers and Medicine: A Social History of Infant Feeding, 1890-195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Fildes, Valerie A. *Breasts, Bottles & Babies: A History of Infants Feeding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6.

Heywood, Colin. *A History of Childhood*.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1.

Kinney, Anne Behnke,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Lawrence, Anthony. *The Taipan Traders: A Portrait of Hong Kong's Days of Youth from the Finest Collections of China Trade Paintings*. Hong Kong: Form Asia Books Limited, 1992.

Müller, Anja, ed. *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e and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Schofield, R. and D. Reher A. Bideau, eds.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hahar, Shulamith. *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Stone, Lawrenc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Sussman, George D. *Selling Mothers' Milk: The Wet-Nursing Business in France, 1715-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Wolf, Jacqueline H. *Don't Kill Your Baby: Public Health and the Decline of Breastfeeding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1.

Yalom, Marilyn. *A History of the Brea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四、論文

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發展——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95-230。

里村編輯，〈育嬰民俗風情博覽〉，《母嬰世界》，期 2，2002 年 2 月，頁 30-32。

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許慧琦，〈一九三〇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

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東華人文學報》，期 4，2002 年 7 月，頁 99-136。

連玲玲，〈「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4，2006 年 12 月，頁 1-50。

盧淑櫻，〈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嬰兒哺育與母親角色的重塑，1900-193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9 年 9 月。

Apple, Rima D.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8:1, April 1995, pp. 161-178.

Benzaquén, Adriana S. “The Doctor and the Child: Medical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nja Müller, ed., *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e and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pp. 13-24.

Davidovitch, Nadav. “Negotiating Dissent: Homeopathy and Anti-Vaccination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obert D. Johnston, e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History of Alterative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North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1-28.

Fort, Bernadette. “Greuze and the Ideology of Infant Nurs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Anja Müller, ed., *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e and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p. 117-134.

Knodel, John and Etienne Van de Walle. “Breast Feeding, Fertility and Infant Mortality: An Analysis of Some Early German Data,” *Population Studies*, 21:2, September 1967, pp. 109-131.

Morel, Marie France. “The Care of Children: The Influence of Medical Innovation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on Infant Mortality, 1750-1914.” In R. Schofield, D. Reher, and A. Bideau, eds.,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6-219.

Breast-Feeding versus Bottle-Fee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Nursing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Chun-Yen Chou

Abstract

Children did no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Recently, however, children's importance in human culture was rediscovered, stemming from the weakened Chinese nation and the Western influence. Women, being a "Nation's Mother," were asked to stay home and protect the nation's offspring. To benefit both mother and infant, the Chinese start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est infant feeding methods.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s in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breast milk" from breast-feeding and "cow milk" from bottle-feeding became extensively discussed nursing topic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research delves into four key elements: first, how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 was rediscovered; second, breast-feeding and wet-nursing from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academic's point of view; third, deciding factors of cow milk and such dairy products in the infant's market; finally,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between breast-feeding and bottle- feeding.

Key Words: breast-feeding, wet nurse, bottle-feeding, dairy products, children